

新思想指引新征程

学校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可不是一个象牙之塔，也不是一个桃花源。办好思政课，就是要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引导学生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之中。

——习近平 2019年3月18日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

让“三点半”后的生活更有意义

02版 热点



近年，“三点半”问题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国家、地方和学校都采取了相关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家长的后顾之忧，然而如何提升校内外“三点半”后学生的生活质量，让学生“三点半”后的生活更有意义，是需要进一步关注的问题。

人民视觉 / 供图
(详见 02 版)

借鉴别国经验需深度分析 该国教育政策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背景

迈克尔·萨德勒以比喻揭示了借鉴论的简单化倾向：“我们不能随意地漫步在世界教育制度之林，就像小孩逛花园一样，从一堆灌木丛中摘一朵花，再从另一堆中采一些叶子，然后指望将这些采集的东西移植到家里的土壤中便会拥有一个有生命的植物。”有效地借鉴别国教育政策的前提是深入地分析该国教育政策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背景以及教育政策自身的文化与社会适应性，在此基础上分析跨国借鉴的可行性。

教育政策借鉴的根本目的是指向本国教育政策的自主发展和内生发展，进而促进本国教育的进步。菲利普斯分析了不同

政治经济背景下教育政策借鉴的动力机制，提出系统的教育政策借鉴模型，即“跨国吸引—决策—实施—内化/本土化”。在他看来，“教育政策借鉴通常是一种外来教育政策或实践被一个国家所改变和调整，继而实施和吸纳的复杂过程，这是一种‘内化’和‘本土化’的过程”。针对本国教育问题和教育发展的社会环境，探究所借鉴的他国教育政策在本国的适应性条件，在本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中探索解决本国教育问题的路径。在教育改革的思维方式上，克服“外部冲击—本国回应”或“外国良方治疗本国疾病”的固有思维，在本国的社会经济与政治改

革的空间中寻求教育政策的内生力量之源，促进本国教育政策的改进。站在本国立场上“平视”世界各国教育政策之间的差异、思考和解决本国教育问题，会得出与“仰视”发达国家教育政策而盲目借鉴的不同效果。

教育政策借鉴的前提假设是国家间的教育发展水平不均衡，教育发展水平低的国家需要借鉴别国的经验来解决本国教育发展中的问题。然而，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也有值得输出的优秀经验。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而言，所有国家的教育政策实践都值得关注。教育政策研究者须深入分析某项教育政策与其原初所处

社会环境的关系，探究该教育政策的演进过程，挖掘教育政策背后的社会行动逻辑和文化精神，寻求解释教育政策的决定性力量。在分析教育政策与社会存在之间关系的过程中，教育政策比较研究将在多元文化中生成新的教育政策知识。由此，对于弱势与边缘地位的国家教育政策研究，即便没有教育政策实践的借鉴价值，也能生成新的教育政策知识，“非西方社会积累的教育经验有潜力为更广阔时空之下的教育政策和实践的理论研究作出贡献”。

（《比较教育研究》2020年第11期《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政策比较研究》魏峰 文）

本期导读

测评：我国普通高中
学生批判性思维状况

05版

青春期孩子的教养策略

04版



“慢就业”的内涵
及主要类型

03版

全球数字素养与能力
标准框架

08版

美与全人教育

06版

《学记》何以建国君民？

10版



人民教育家 于漪

要通过语言文字
直抵学生的心灵

07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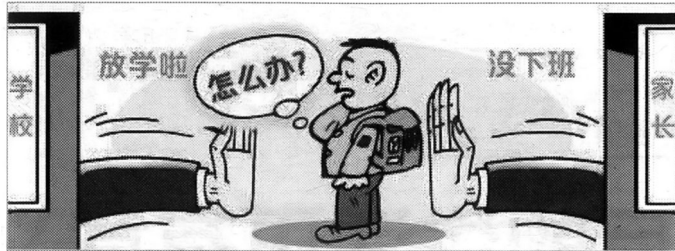
本版责编：王小五
电话：(010)62003971
E-mail: xiaowusmile@163.com

“三点半”后学生去哪?

校内课后服务

在课后服务模式中,学校托管扮演着重要角色,学校托管相比其他托管模式来说,具有独特的优势:首先,学校的教师都是经过专业培训的,能够提供高质量的课后服务;其次,学校具有教室、操场和图书馆等基础设施,满足开展课后服务需要的设备条件;最后,在学校托管,方便对学生进行管理,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学生的人身安全。

学校开设各种兴趣班,充分利用学校的设施,但是在活动过程中都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此外,有很多学校从校外聘请专业人员进入校园授课,社会团体进入学校,不同素质的人员,也对学校的教育活动造成了诸多安全隐患,也给学校教育管理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学校作为有限主体责任,并不承担无限责任,但



图片来源:搜狐网

是学生一旦在课后服务时间出现安全事故,社会和家长一定会把责任都推给学校,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校外托管机构

小学三点半放学,与家长的上班时间冲突,这催生了大量的校外托管机构,这些机构负责接学生放学,并为他们提供晚饭,成为晚归家长的首选。家长担心缩短在校时间会影响孩子的学习,这些机构打着“快

乐学习”的口号,将校内课堂延伸到校外,这正好符合家长们的心意。但这些托管机构中,有一些资质不全。

学生放学后,通常会有一个或两个托管机构的老师负责接学生,从学校到托管机构的这段路程,老师带着十几个孩子本身就有很大交通安全隐患,且小学阶段的学生安全意识薄弱。一旦学生出现意外,家长必定会追究托管机构和学校的责任。

社区“三点半课堂”

“社区三点半课堂”是创新性的活动,将社会的力量融入到学生的教育中,既减轻了教师的负担,又比校外培训机构更安全,具有推广的意义。但“社区三点半课堂”依然有较大的安全隐患,需要不断完善。首先,社区的志愿者流动性较大,这加大了管理的难度,对学生来说也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其次,社区的场地和设备安全性无法保证,学生在活动过程中更容易受到伤害;最后,社区的管理人员并非都是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员,可能难以预见潜在的安全隐患,当意外发生时,不能及时处理,将对学生的伤害降到最低。

《《教育探究》2019年第5期《试论“三点半”现象下小学生如何“安全减负”》李护军文)

构建“学校、家庭、社区教育一体化”课后服务

多层次社区教育内容对应“三点半后”的课程空白

社区除了在放学之后给学生一定程度的生活照顾之外,更重要的是给学生提供一个行之有效的课程体系。它综合了学科知识、生活知识以及技能知识,以整合性方式承载于各种课外活动,其内容应尽可能地涵盖德育、素质拓展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心理成长教育、体育健身、法律教育以及主题文娱活动等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课程。小学生从中习得经验和扩大认知,培养习惯,塑造品格,获取资源,拓展交际,学会反思,增强体质,培养积极心态和主动参与意识等。如此这般多层次、立体化的社区共同体的实践活动,使得小学生在能够参与社会实践和艺术互动的同时,建构公民道德、习得自身修养和促进社会化稳定发展。

“三点半”难题:学校课后服务存在短板

其一,提供的社会服务功能比较单一。一方面,由于学生在校时间的延长,学校责任进一步扩大,为了确保学校责任的稳妥落实,安全被置于首要地位,因此学校不得不更多地履行看护等功能,提供少数安全性较好的活动,鲜有涉及其他功能。另一方面,由于学生放学后学校和教师被“义务性”地要求提供和履行额外服务,缺乏必要激励,学校和教师缺少动力探索提供多样化的社会服务功能。此外,有关政策不够明朗,也限制了学校多种功能的发挥。受此影响,学校在学生放学后对提供丰富多样的社会服务功能缺乏积极性,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学生社会交往能力、

文化素养提升、娱乐休闲需求的满足与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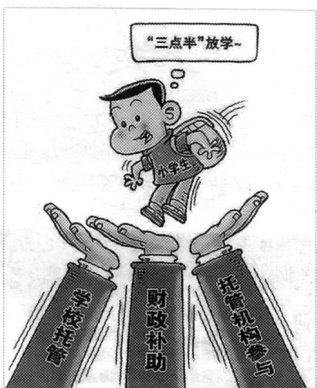
其二,社会服务时间比较短。这不仅体现在每个学习日在校时间比较短,往往与家长的下班时间不能很好地衔接;也体现在由于教育具有周期性,学校提供社会服务的时间也具有相应的周期性,主要表现在以星期和学期为周期的变化,社会服务功能并不能覆盖至周末,也未拓展到暑假。由于家长的上班时间与教育周期变化难以匹配,家长对学校有着较高的期望,希望能够延长学校提供社会服务的时间,但在现实中难以实现,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校对群众实现美好生活的期盼。

其三,收费政策易被简单化为禁止收费。由于乱收费的界定并不清晰,实践中容易导致“合理收费”也被纳入禁止范畴。由于缺乏清晰的法律法规依据,造成地方政府和学校在治理“三点半现象”时不能收费、不敢收费。但是,各种教育活动的开展必须有相应经费保障,若无经费来源,各类活动的开展必然受限,从而极大影响“三点半现象”治理的可行探索。因此,应及时修订相关政策,开辟多种资金来源渠道,否则学生放学后活动的开展将难以为继。

其四,学校自主权弱化,家长参与学校治理机制不畅通。我国对“三点半现象”的治理主

要是以政府的行政命令为主,学校在其限定语境中照章办事,自主权较弱。实际上,学校应该是政府和社会的主要依靠与利用力量。在当前我国社区资源不充分、不完善的条件下,更应当充分利用学校的存量资源。同时,由于学校具有场所安全、管理规范、师资优秀等优势,因此,学校事实上是理想的课后服务提供主体。这些功能良好发挥的前提是赋予学校必要的自主权,让学校既能够又有意愿去探索多样且富有创意的“三点半现象”治理办法。

《《教育研究》2019年第4期《“三点半现象”难题及其治理——基于学校多功能视角的分析》马健生 邹围 文)



图片来源:搜狐网

多元化教育资源对应“三点半后”的教育资源匮乏

首先,为了搭建社区教育资源共享平台,保障社区教育的顺利开展,相关部门可制订并推行社区教育相关的实施意见,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从而保障小学生课后社区教育活动有经费、有场地、有设施、有人才。其次,为了累积社区教育的人力资源,除了发动有条件从事小学生课后教育教学活动的社区居民,社区还可以与辖区内各类学校、社工机构和社会NGO组织建立合作关系,鼓励上述机构组织中的教育人士参与到“三点半后”社区教育中来。除了依靠上述政策支持和外界组织参与之外,社区还应调动社区工作人员进行资源开发。社区可设立“三点半后”社区教育专员这一职位,安排有教育教学经验的人员结合小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自主开发与小学教育步调一致、与小学教学内容互补、以提高小学生公民素养和创新能力教育内容。

《《教学与管理》2020年第9期《破解“三点半难题”的“教育一体化”模式探讨》吴爽 文)

课后服务带来的“新”问题

课后服务的相关及配套政策问题

学校实施课后服务的操作标准和规范。课后服务无论归属公共服务体系还是市场服务行为,都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规定,出台相关政策以确保课后服务尽快落实。从政策要求看,课后服务的定位、服务设施条件、服务内容、服务经费、师资配备等方面,都没有明确可以操作的标准和规范。谁来出台管理规范标准,是教育管理部门、工商管理部门,还是技术监督部门,或是行业协会,都是个“新”问题。

教师课后服务收入的保障政策。如何正确理解课后服务实施后学校的职能转变?学校

教师为学生提供的课后服务是否应纳入公共服务范畴?对教师课后服务工作如何进行认定,以何种方式确立相应的最低服务金标准,对表现优异的教师实施补助、补贴等,这些课后服务实施后产生的现实性问题亟须出台补充条例跟进解决。政府层面只有政策支持,并未有专项资金保障,很难使课后成为教育制度的一部分,保障课后服务长久顺利实施。

课后服务教师工作量核定问题

以往教师的工作总量都是依据教师在校工作时间进行计算,很少将教师在课后的各种服务工作纳入进来。所以,教师参加课后服务所增加的工作量应

如何计算?是纳入额外的工作时间,还是计入日常教学工作时间总量中?尤其是对于表现优异的,教师给予补贴和奖金,如何确定最低服务金标准等也亟需教育主管部门出台相关标准去评定和量化工作绩效。

课后服务引发的学校责任边界问题

课后服务是重新审视教育的过程。学校不愿意承担过多责任,延时服务是在增加学校的责任,因此,需要重新界定并明确家校的责任边界,尤其是让家长充分认识到自己的教育责任。

课后服务作为惠民工程不应仅站在政府的立场,也应该站在学校的立场和教师的立场,给学校适当卸责减轻压力,

并给予更多的支持和保障,提高课后服务质量。家长作为在课后服务中的利益主体之一,既需要作为购买方提供相应费用,也需要对学校进行一定监管和支持。家庭、政府和社会都应该认识到学校教育能起到的作用相对有限,学校理应承担无限责任的这种错误认识必须改变。不能将大教育所起的功能强加为学校教育的“应然”。学校教育并非万能,只是一个施加教育影响的场所。教师也并非万能,对学生施加的影响也具有局限性。否则,只能增加教师的心理负担。

《《中国教育学刊》2020年第11期《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课后服务的再思考》李醒东 赵伟春 陈蕊蕊 文)

“慢就业”的内涵及主要类型

“慢就业”的内涵

当前不少大学生在毕业后并不急于找工作,而是选择“毕业待定”模式延缓就业。根据 2018 年 8 月《中国青年报》发布的数据,72.9%的受访者周围有毕业而不就业的大学生,可见延缓就业已成为大学生就业的一种普遍现象和新特点。媒体使用“慢就业”一词来描述高校毕业生延缓就业的状态,将其定义为高校学生毕业后不选择就业也不选择继续深造,而是选择暂时游学、支教、在家陪父母或者创业考察等,不立即投身于工作的现象。近年来在高校学生中悄然兴起的“慢就业”现象,按就业动



图片来源:网络

机可以分为积极“慢就业”和消极“慢就业”两种类型。

积极的“慢就业”

积极的“慢就业”与国外学生流行的间隔年(Gap Year)类

似,表现为学生在毕业后不立即进入职场,而是在不长的时间内通过留学、志愿服务和旅游等来丰富自己的阅历。这种积极的“慢就业”可以提高学生的独立自主性,培养学生理性思考和社会参与的能力。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大学生选择积极“慢就业”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经济的快速增长促进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更多家庭有条件为大学生离校后提供一定的经济支持,为他们的“慢就业”提供物质保障;另一方面,随着新经济和新业态的快速发展,人们的择业观念发生转变,不再追求传统意义上的“稳定”工作,高

校毕业生面对多样化的就业形式有了更多的选择,因此,他们需要一定的时间去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

消极的“慢就业”

消极的“慢就业”是指由于职业规划迟缓、技能准备不足、就业岗位缺乏等就业困难导致的暂时不就业。其原因包括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两个方面,主观上,从就业心态来看,刚毕业的高校学生因就业心态不成熟、缺少职业规划等而产生认知偏差,当理想与现实存在差距时,他们因“高不成低不就”产生逃避心理;从就业观念来看,部分学生受到父母辈择业

观念的影响,毕业后坚持考公务员或为了进入国企等而选择暂缓就业,甚至一些学生出现“啃老”现象,逃避就业竞争。客观上,从我国高等教育的现状来看,部分高校的专业课程设置未能及时调整,传统的教学内容和方法不能适应新经济和新业态对人才的要求;从用人单位的需求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的产业升级转型,导致高校毕业生在行业间、职业间和区域间的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一些学生不得不为了学习新技能而暂缓就业。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9 年第 5 期《高校毕业生“慢就业”探析及其对策》马力 邓阳 文)

高校毕业生“慢就业”的成因分析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大学生毕业后花费较长时间寻找工作,或者在没有遇到适合的、理想的工作时持观望态度,继续等待时机,这种“慢就业”现象可以用社会心理学进行解释。高校毕业生刚刚接受完高等教育,即将离开校园进入职业领域,他们对自己价值实现的追求,比一般大众更为急切。这种心态普遍存在,容易导致部分毕业生好高骛远,在求职过程中过于关注自我价值实现,追求高层次需求的满足,希望选择的工作能够一次性达到自己的理想要求,因而对现实社会所能提供的大部分就业岗位“不满意”甚至“不屑一顾”。这种择业观的变化直接导致了大学生在就业时期的观望心态和“慢就业”现象的出现。同时,还与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使得大学毕业生拥有较好的经济基础,能够承担延长求职时间的经济成本。



图片来源:网络

大学生自我角色认同的迷失

从更广泛的社会视角来看,大学生的求职就业过程是一个角色发生转变的过程,即从学生角色转变为职业角色。在此过程中,部分大学生发生了角色认同迷失,导致了“慢就业”现象的产生。前面提到部分学生在就业过程中“觉醒慢”,其深层次的原因是没有

认识到自身社会角色需要发生转变这一事实。大学生长期处于安定、规范、程序化的校园环境中,对于毕业后身份角色的转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对于自身未来没有清晰的定位。甚至一部分毕业生对自身的就业能力、工作能力缺乏自信,不想转变学生的身份,不愿意真正投入到就业活动中,以学习、考研、考察为借口,长期在学校或者学校附近

生活,变成了“赖校族”。

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的缺失

从职业生涯规划阶段来看,大学生处在职业探索期,需要在这阶段逐渐确定自身的职业倾向。高校虽然普遍开展了各种类型的职业规划教育和就业指导工作,但因为教师队伍良莠不齐、缺乏相关课程体系、很多课程无法落实等原因,成效非常有限。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的缺失,使得大学毕业生普遍缺乏基本的职业生涯规划意识和能力,对自身的职业兴趣、职业能力没有充分的了解,职业生涯目标不够清晰,方向飘忽不定,无法快速地搜寻对自己有价值的就业信息,在就业过程中会出现“决策慢”和“行动慢”现象。

《社会科学战线》2019 年第 3 期《高校毕业生“慢就业”现象的成因与治理策略》郑晓明 王丹 文)

大学生“慢就业”现象逐步显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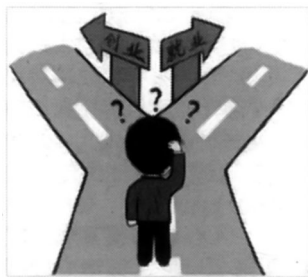
纵观国内及全球经济形势,自 2010 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逐渐放缓,经济运行面临下行压力;世界范围内,尽管经济逐步复苏,但全球经济仍然存在很多不确定、不稳定因素,逆全球化思潮、贸易保护主义、部分地区和国家的经济波动等都给世界经济复苏蒙上了阴影,就业形势将越来越艰难已是不争的事实。而我国自高校扩招以来,高校毕业生人数一直在逐年增长,中国高等教育在十年时间内迅速地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的转变。根据教育部最新调查数据显示,我国 2019 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约为 834 万人,再创近 10 年毕业生人数新高。2012 年开始,各大媒体都提出“史上最难就业年”的说法,据央视网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张翼认为接下来的每一年或许都将是大学生的“最难就业年”。

与社会和新闻媒体普遍认为就业困难不同的是出现在高校毕业生中的“慢就业”行为。“慢就业”这种现象自 2014 年,2015 年开始显现,近年来有越来越明显和强化的趋势,2016 年 7 月,腾讯发布的一份针对“95 后”的报告显示,该人群选择找一份稳定工作的比重为 52%,但余下 48%的人选择回避就业。麦可思研究院今年 6 月发布的《2019 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2018 届中国大学生毕业半年后就业率为 91.5%,相比去年下降 0.4%。毕业半年后的去向调查显示,2018 届本科毕业生待就业比例为 4.2%,高职高专毕业生待就业比例为 7.5%。而据中国青年报 2019 年 1 月 3 日新闻报道,在接受采访的群众中,有 72.9%的人认为周围存在“慢就业”的大学生。

《人民论坛》2019 年第 20 期《当前高校毕业生“慢就业”现象研究》刘宇文 文)

我国存在大量的长期失业青年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统计,2018 年会员国 15—24 岁青年失业率为 11.1%(全体为 5.3%)。研究表明,当失



图片来源:凤凰网

业时间超过 1 年,会给失业者造成极大的心理负担,严重打击失业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再就业的难度和阻力呈几何式增长,这部分失业者极有可能沦为长期失业者。当前发达国家长期失业青年的规模和数量呈现出上升趋势。基于 2015 年统计数据,经合组织国家青年失业人员中失业周期在 1 年及以上的占比为 20%,而欧盟 28 个成员国的相应比例达到 1/3。“六普”数据显示,我国青年平均失业时间为 10.4 个月,长期失业青年的占

比已接近 20%。这表明我国青年失业时间的长期化趋势值得警觉,长期失业青年问题值得高度关注。

随着家庭收入的不断提升,加之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健全,发达城市家庭经济支持能力较好等因素,这些未能及时就业的青年逐步丧失就业意愿,沦为长期不就业的“宅男宅女”一族。因而上海、北京、深圳等国内经济发达城市率先关注到长期失业青年的就业问题。而随着全国各城市、地区经济社会的不断

发展,长期失业青年就业问题将从发达城市向二、三线城市乃至越来越多的地区陆续蔓延,由局部问题演变为全面问题,从个别地区扩展到全国各地。也有学者已经指出,由于就业压力较大、独生子女群体增多等因素,相对于“4050 老失业群体”,城镇中已经出现“新失业群体”,即“2030 不就业人员”,这部分年轻失业者的规模有不断扩大的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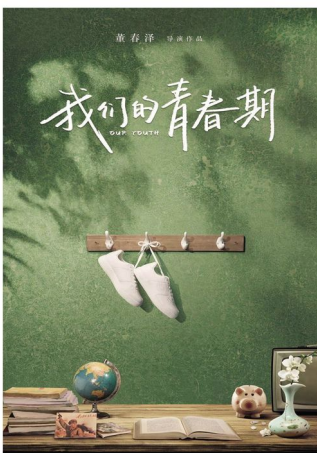
《当代青年研究》2020 年第 6 期《长期失业青年就业状况分析及对策》侯立文 文)

青春期孩子的教养策略

开展性教育,让孩子不再彷徨。孩子的身体发育,特别是性的发育是影响孩子心理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女孩在初潮,男孩在第一次遗精时,他们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有的甚至认为自己生病了,而心理的封闭性决定了孩子又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这就让青春期的孩子感到恐惧和焦虑。所以在青春期到来之前,也就是女孩 9 岁、男孩 10 岁的时候,家长就可以进行性教育,特别是同性家长,要告诉孩子身体发育的一般规律,确保孩子生理变化前得到应有的指导,更好地适应身体的变化,避免恐慌和焦虑。

有的家长认为,对孩子进行性教育会不会让本来无知的孩子更了解性,对孩子是一种诱惑,会造成孩子早恋。纵观世界性教育开展的情况可以看到,北欧国家在家庭和学校进行丰富而科学的性教育,并在学校、诊所等青少年活跃的地方免费提供避孕药品,而这些国家和地区青少年性行为发生率并没有高于北美,相反,这些国家怀孕率、出生率和流产率都低得多。在我们这样一个传统的国度,对于性教育的了解较少,抵触更多,所以需要家长的智慧,更需要勇气。

科学民主教养,孩子心理更健康。遵从孩子的性别特点。



图片来源:搜狐网

男孩跟女孩生理和心理不同,社会对男孩和女孩的要求也不

同,男孩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需要心胸豁达、勇敢刚毅;而女孩相对柔弱一些,但承担的家庭责任更多,所以可以培养她们温柔善良的气质特点。

鼓励孩子的双性化,让孩子在发挥自己的“性别”优势的同时,要克服自己性别上天然的弱项,向异性学习,促进身心的全面发展和人格的完善。比如让男孩多多学习女孩的细心、善于表达和善解人意;让女孩多多学习男孩的刚毅、坚定和开朗。有不少性格或行为特征,如热情活泼、独立自主、坚忍不拔、富有责任心、善解人意、无私善良等,应是男女两性共同具备的,不宜被视为某种

性别专有。同时,双性化不是中性化,是让孩子在需要冒险和挑战面前表现出勇敢和无畏,在合作和沟通中体现出耐心和细致。

必要的理解和限度。在鼓励孩子向异性学习时,必须顺其自然,切忌威逼强迫。在家庭中父母应互相关心、互相体贴,丈夫要摒弃大男子主义作风,在家庭中主动承担家务,爱护、体贴妻子;作为妻子,也不要过于娇气,要学会坚毅和刚强,在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要坚持不懈,做到自立、自强。

(《中华家教》2020 年第 9 期《青春期男女大不同,教养策略有“专攻”》马青林 文)

培养规则意识需要温和而坚定

良好的家庭规则除了对孩子的日常行为起到引导和约束作用,还会使孩子在实践中获得认同感和安全感。在不同家庭里,家长立规矩的方法各不相同,但目标都是培养孩子良好的品质,使其健康成长。家长应怎样建立有效的规则?

第一,叙述规则要简洁清晰。3~6 岁的孩子,受到理解能力的限制,需要家长简单的、指令性的表述。例如孩子企图触摸电器时,家长要及时说“停止,不能摸”,而不是“离它远一点”等模糊指令。第二,规则要有实效性和可操作性,甚至可以和年龄适当的孩子展开讨论,斟酌修改。家庭规则是家人间顺畅沟通的保障,而不是制造矛盾的工具。第三,提前说明孩子不遵守规则的后果。如果实际执行过程中出现意外情况,则需要家长灵活处理。第四,规则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进行调整,难度与对应性都必须匹配实际生活内容。建立规则的初衷是为了让生活更有秩序,而不是让人机械地服从。第五,家庭规则要有唯一性,家庭成员要有统一的意见。一旦有人出现背离,会使孩子感觉混乱而无所适从。

家庭中每一条规则在建立、实施初期,都可能会因为各种原因而产生冲突,家长要做好与孩子展开拉锯战的心理准备。规则意识的培养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多方共同努力。为使规则的利用达到最好的效果,可以按以下三个方式推进孩子的规则培养过程。

个性与规则的统一。在孩子的教养问题中,保持个性与建立规则同等重要。不要规则的个性是可怕的,可能带给社会危害,也带给孩子烦恼;盲目制定规则,压制个性的发展也会产生矛盾。

如何平衡个性发展与规则建立?规则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家长应根据孩子的个性和实际情况做出调整,使他明白规则的意义。实际上,很多家长都有这样的经验,好奇

心和求知欲极强的孩子在温柔的劝说下并不会立即听取建议,反而会出现做出家长所禁止的行为。这些个性具有鲜明特点的孩子,需要父母坚持劝说,采取积极的引导策略,同时给予适当惩罚,才会遵守规则。

亲子沟通助力规则搭建。亲子之间无话不谈,是家庭教育中最理想、美好的状态。良好的沟通是孩子愿意遵守规则的基础。亲子间坦诚的交流,使得很多问题得以在和谐平静的沟通、包容理解的氛围中得到解决,有利于孩子形成优良的个性。家长在舒适的沟通氛围中可以近距离地观察孩子,和孩子一起成长,和他们一起感受生活,从而建立家庭特有的规则,每条规则都是令人信服且充满弹性的。

给孩子充分的自由。这里的“自由”,是指给孩子充分发展潜力的自由,充分探索和认知的自由。孩子在游戏或者与同伴的交往中,会自动约定一些规则并能很好地遵守它,例如游戏规则、卫生规则、交通规则等。这些规则是孩子在生活中、游戏中自主建立的,符合孩子身心发展与内在需求。孩子愿意遵守自己创造的规则,一旦孩子创造的规则被破坏,他们会十分生气。在孩子眼中,用自己创造的规则进行交往、开展游戏是具有极大趣味性的。

由此可见,提高规则意识、养成规则行为,需要长期努力。首先,成人要创设良好的交往环境,让孩子在平等、融洽、和谐的人际环境中获得发展。其次,充分了解孩子的年龄特点和心理需求,制定适合他们能力和兴趣特点的规则要求,并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通过抓住教学活动和一日生活中的教育契机,持续不断地为孩子提供体验、实践的机会,使他们养成习惯。孩子一旦养成良好的习惯,便不用再借助记忆,而规则也能很容易、很自然地发挥作用了。

(《教育家》2020 年第 43 期 黄春燕 文)

心理韧性与人际关系

心理学研究发现,适应能力强的人往往在人际交往中也更加自如,即使遇到困难,他们也会很快调整,不会在一件事情上长期纠缠不休。相反,适应能力差的人则容易在人际交往中出现问题,且往往怨天尤人。但要注意的是,在人际交往中一味顺从、适应他人者并不意味着适应能力强,真正的适应能力强是指能够正视问题的存在,并设法解决问题,使得相应的人际关系健康发展。

通过言传身教,我们可以帮助孩子学会如何增强适应能力。心理学家发现,适应能力强的人不仅其自身处理问题的能力,且对子女的影响力也强,更容易担当好作为父母的角色。

研究发现,注意教孩子一些有用的应对困难的技巧,让他们在适当的情况下使用,会大大增强孩子的自信,让他们觉得自己坚定、有力,且处事冷静、有效,这种能力的培养对于青春期的孩子而言更为重要。

学会适应

遇到困难时一往无前只是心理韧性的一部分。除此之外,学习、个人的信仰、道德情操、个人经历等都会对一个人的适应能力产生影响。多数心理学家相信,虽然人生来在心理耐受力方面就有一定的差异,但个人经历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事实已证明,父母、老师等教育者可以利用个人的经历培养一个人的心理

耐受力,同样,一个人也可以有意地锻造自己的心理耐受力。

点点滴滴 锻造心理韧性

在面对危机时不要一蹶不振。放眼未来,并积极从当前事情中学习如何应对,这样在未来类似事情发生时,你就会有所准备。很多人在经历逆境后更加珍惜自己的配偶或家庭,生活目标更加清晰,对人更加宽容,对事情更加豁达。

学会适应变化。人生即意味着不断变化,要逐渐适应、接受新的现实,随时调整生活目标。少沉溺于过去,着眼现实,为所当为。

制订目标并逐渐接近目标。制订一些现实可行的目标,并定期为这些目标做出一些切实的努力。比如,有人想去考成人本科文凭,但觉得目标过于宏大。这时最好的办法是把这一目标分成很多小目标,比如每 6 个月完成几门课,这样就会逐渐接近直至最终实现这一目标。

要学会当机立断。在面对困境时,要及时采取行动,积极面对危机,回避问题往往会使问题更加难以解决。

挑战自己,发现新的自我。要走出自己的舒适地带,创造并迎接新的挑战,如学习新的技能,去探险旅游,参加新的体育运动等。很多人会发现在面对挑战后会对自己有新的认识,发



图片来源:网络

现自己以前没有意识到的能力,或发现自己更加成熟。因此在适当的时候要挑战自己,这样可增加自己的心理韧性。

善待自己。千万不要忽视自己的需要和情绪,倾听自己内心的需求。要寻找培育自己喜欢的业余爱好,学会让自己放松。要保证自己有充足的睡眠,要找时间锻炼身体。善待自己可以让自己的身心处于良好的状态,一旦出现逆境或困难,你就能更好地应对,从而锻造心理韧性。

保持乐观,不放弃希望。保持乐观的思维,往往会增加成功的概率。要经常想象你想要什么,如何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得到,少花时间去担心如果做不好怎么办。爱迪生曾说过:“失败也是我需要的,它和成功对我一样有价值,只有在我知道一切做不好的方法以后,我才知道做好一件工作的方法是什么。”

(《心理与健康》2017 年第 10 期《锻造心理韧性:幸福生活的秘诀》汤宜朗 毛佩贤 文)

重视“后台性知识” 培养批判性思维

当代大学生仍然普遍缺乏批判性思维,基础教育阶段针对批判性思维的教育甚至存在空白,突出表现在知识的拥有量很大,却缺乏准确理解、公正判断的思维以及独立思考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英文上,理智指的是 *intellect*, 是传统的命题导向的知识观之于“是什么”的阐述,是一种理论活动,关涉了前台性知识。智力是 *intelligence*, 指向的是“为什么”的问题,是一种体现在行动中的知识,关涉了后台性知

识。前台性知识涉及到知识的拥有量,后台性知识涉及到知识的应用与转化。当前教学活动中“理智”与“智力”的混淆会导致学习者从“前台性知识”到“后台性知识”的通行障碍。表面上掌握了大量的知识储备,智力上的差异却不能归化为所拥有的命题性知识的多少,赫拉克里特谓之“博学并不能使人智慧”。认识论中“理智主义传奇”的流行教条导致前台知识与后台知识的混淆,制约高阶思维的形成,需要置身于默会知识论维度进行

探讨。

回到实践层面,学习的最终归宿落脚于高阶思维。如果绕过知识本身的属性,考虑到知识占有的范畴,可将后台知识划分为不同的形态:现象的形态、概念的形态、方法的形态和价值的形态。现象的形态是“知道发生了什么”的知识,可以理解为与事实、现象、信息等“打了个照面”;概念的形态是“了解所发生事情的本质”的知识,指向的是对所认识的事实、现象、信息等有了背后原理、属性方面的了解;方

法的形态是“掌握怎么做”的知识,指向的是概念和原理背后的方法;价值的形态是“思考为什么存在以及存在的意义”的知识,指向的是方法背后的价值判断与价值内化。从认知过程来看,后台性知识的四个表现形态呈现层层递进的特点,从不同形态知识螺旋上升的过程,可以观照批判性思维关键能力的培养。

长久以来,传统的教学方式注重对知识单向度的传递,受命题导向知识观的影响,处在“保持”状态的知识占据了大

多数。在知识获得层面,后台性知识的不同形态到达了何种水平,并没有清晰的界定,学生的高阶思维如何培养,也缺乏有效的探讨。如何弥补传统学习过程偏重对前台性知识单向度传递的误区,将关涉批判性思维的后台性知识作为教育培养的高阶目标,应当成为当下教育目的的现实诉求。

(《当代教育科学》2020 年第 9 期《学生批判性思维进阶的实践逻辑——基于默会知识论的视角》李永婷 文)

批判性思维导向的学习环境设计

设计批判性思维导向的学习环境的核心在于通过学习环境各个要素的设计,使其具备培养批判性思维特有的特征,为促进批判性思维发展提供有效的教学干预,进而使整个学习环境为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给养”。批判性思维导向对于整个环境的干预不仅仅体现在学习活动上,还体现在各个活动支持要素上。

1.情境展现真实性。批判性思维的培养不应该在形式的或者是数学化的情境中展开,而应该在基于普通语言、解决日常生活问题的环境中进行。只有基于真实的情境,学生才能对情境中的问题有着更加清晰的认识,利用思维技能解决问题。

2.资源满足丰富性。资源的丰富性体现在充分性和多角度性两个方面。数量充分的资源可以帮助学生判断信息是否真实、是否相关以及是否全面等。这种判断是批判性思维的重要体现。除了判断之外,通过已有信息进行推理以及归纳也是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技能,而推理和归纳也需要建立在大量资源的基础上。另外,资源的多角度对于批判性思维发展也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当资源来自不同的角度,会锻炼学生们对于资源中信息的深层次分析,挖掘立场和角度与资源呈现之间的关系,进而促进批判性思维的发展。

3.工具具备交流性。工具对于批判性思维的促进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能够实现在线同步和异步交流上。同步交流能够使学生对某一问题进行充分地互动式讨论。在课上时间十分有限的情况下,线上同步交流能够使活动得到很好地延伸,学生的参与度会比面对面讨论时更高。异步活动在时间上相对灵活,可以避免面对面及同步交流时出现的由于插话、抢话、个别成员过于主导等限制其他成员发言机会的现象,能够帮助学生更为充分地思考以及完成任务。

4.共同体体现合作性。共同体的合作性是指同伴之间的合作与协作。合作性对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有着积极的影响。协作和合作学习通常要求学生们以小组的形式解决一个问题或者形成一个方案。在这一过程中,学生需要进行认知重构以解决矛盾,还需要学着进行社会性的交流、互动、分析以及推理。无论是互动中的矛盾解决还是意见统一都会对批判性思维起到积极的作用和影响。

5.支架突出引导与示范性。批判性思维导向的学习活动通常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学生在完成活动的过程中会遇到不同的问题和困难。为了使活动朝着既定的目标顺利进行,适当的引导和示范是必不可少的。在引导和示范的帮助下,学生会更加明确任务的方向和具体运用思维技能的方式和方法。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3 期《批判性思维导向的学习环境干预模型及策略——一项基于设计的研究》卢丹 解月光 文)

测评:我国普通高中学生批判性思维状况

1.我国普通高中学生批判思维的高倾向、低能力现象比较突出

在批判性思维两大构成部分中,我国样本高中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倾向较高,但批判性思维能力较低。在批判性思维倾向中,客观性、主动性较高,但公正性、独立性、严谨性三个倾向较低。说明学生对批判性思维的价值认同已经形成,但批判性思维的品质发展明显滞后,尤其客观理性不足,这是应当引起重视的。我国普通高中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整体较低,近一半的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处于比较低的水平甚至是极低的水平,在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四个层级中,聚焦与界定能力相对最高,在分析与评估、推理与论证、审查与矫正几个方面缺少方法,能力难以达到较高水平。在推理、论证、自我审查和矫正等方面缺少指导和训练,基本的能力都难以达到,这些都需要科学方法论的支撑。这一调查结论与我们的预判比较一致,我们认为,经过这些年的教育改革,我国学校和师生对批判性思维的认识逐渐提高,具有鼓励和提升批判性思维的环境,但学生的学习与训练方式改变不大,批判性思维能力提升十分缓慢。

2.我国普通高中女生的批判性思维发展显著好于男生

这是与社会一般认识显著不同的研究结论,这些年我国学校“阴盛阳衰”的现象越来越突出,女生学业等方面的表现越来越突出,男生相对弱势,高考中高分女生越来越多、各行各业优秀人才中女生越来越多,于是一些研究者怀疑我们的选拔评价机制是否更有利于女生,不利于男生创造性品质的表现。这次测评表明,女生批判性思维总体显著优于男生,未必是我们的教育评价制度有问题。我们认为,女生相对优势的出现,应该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不宜更多归因为选拔考试标准。

3.我国普通高中批判性思维发展的年段特征比较明显,总体随年级而升高;理科生批判性思维总体高于文科生;同学关系融洽的学生



图片来源:网络

总体批判思维发展更好;学业成绩与批判性思维总体正相关,但优秀生、后进生都存在两极分化现象

高一年级学生批判性思维倾向非常显著,但能力尚显不足,高二年级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迅速发展,批判性思维倾向也较高,高三年级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明显优于高一高二年级学生,但是两极分化较明显。总体看,优秀学生选择文科的比例低于理科,文科生群体中特优生比例相对理科生更低,这样应该是合理的解释。

研究发现同学关系对学生批判性思维倾向、批判性思维能力影响均显著,同学关系融洽的高中生在两个维度上都比较好,而关系疏远的高中生水平都较低。人际关系融洽不会影响批判性思维,相反可能更有利。

研究发现学业成绩对学生批判性思维倾向、批判性思维能力影响均显著。学业成绩居前(20%)的高中生在两个维度都体现了较高的总体实力,但分化也较明显,说明“高分低能”的情况是存在的,但不是主流。学业成绩排名靠后(后 30%)的总体批判性思维较弱,但部分学生却在批判性思维倾向和能力两个维度都体现了较高的实力,明显超越了很多中等生,“低分高能”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存在的,尽管不具有普遍性。这样的结论说明了学业成绩作为选拔指标总体是可行的,但优秀生中的批判性思维低能、后进生中批判性思维比较突出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

4. 批判性思维的学校差异显著;学校重视自主管理有利于批判性思维发展,宽松的管理并不利于批判思维发展;学校提供丰富活动

有利于批判思维发展,但对能力不足的学生可能适得其反;教师的教学行为直接影响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发展

高中学校层次与学生批判性思维总体状况显著相关,高中名校和优质高中的学生批判性思维倾向和能力都明显更好,农村一般高中学生在批判性思维倾向与能力两个维度都最低。这未必就是学校教育的差异产生的影响,也可能是高中选拔学生的层次不同造成的,高中学校层次与批判性思维的关系需要谨慎判断。

学校管理对学生批判性思维倾向、批判性思维能力影响均显著,注重学生自主管理更利于学生批判性思维发展,管理宽松最不利于学生批判性思维发展。这一方面说明自主管理有利于批判性思维发展,但现实中,重视自主管理的多数是比较好的学校,管理宽松的多数也是比较差的学校,学校管理风格特点与批判性思维发展的关系需要谨慎判断。

学校开展的各种活动总体上对学生批判性思维倾向、批判性思维能力影响均显著,学校能提供更多活动、比赛机会,有利于学生在解决问题中提高批判性思维,但是如果能力有限的学生,参与更多的活动反而可能会抑制批判性思维发展。这样的结论揭示了因材施教的重要性,高中学校应当给能力强的学生提供足够的舞台空间,但学习能力弱、学习压力大的学生,并不适合过多从事超出其能力和经历的活动。这样的结论对学校课程建设和学生活动管理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教师是否鼓励学生质疑对学生批判性思维倾向、批判性思维能力影响均显著,教师鼓励质疑有利于学生批判性思维发展,如果教师本人在教学中能有意识的不断追问学生,引导学生思维走向深入,最有利于学生批判性思维发展。

(《教师教育研究》2020 年第 2 期《我国普通高中学生批判性思维状况与教育应对》戚业国 孙秀丽 文)

调查:推进学校美育 家长最关心课程设置

2020 年 12 月 14 日,教育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三五”期间加强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工作的成就。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介绍,全国已有 9 个省份开始试点美育中考。前段时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学校美育工作进行了深化设计,引发关注和热议。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

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 1506 名学生家长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如下——

受访家长中,来自一线城市的占 29.9%,二线城市的占 48.1%,三四线城市的占 19.8%,城镇或农村的占 2.2%。幼儿家长占 13.5%,小学生家长占 56.9%,初中生家长占 22.4%,其他占 7.2%。

调查中,95.0%的受访家长表示关注《意见》的发布。交互分析发现,二线城市的受访家

长更关注(96.7%),小学生家长(96.5%)和初中生家长(95.9%)关注度更高。数据显示,对于学校美育工作,受访家长最关心怎样安排课程设置(62.2%),接下来的是是否进入升学考试(57.2%)和如何加强师资力量(55.8%)。其他方面还有:怎样开展好艺术实践活动(47.9%)、如何公平考察(44.6%)、怎样培育良好的美育氛围(33.5%)以及如何改善艺术场馆设施设备(32.5%)等。调查中,74.9%的受

访学生家长认为,《意见》的实施能有力促进孩子全面发展,与此同时,55.9%的受访家长也坦言,担心美育会增加孩子的学业负担。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美育要根据学生的兴趣、课程标准来开展,同时改革评价体系,让评价更为多元。

(央广网 2020 年 12 月 18 日《推进学校美育 超六成受访家长最关心课程设置》孙山文)

美与全人教育

教育是人类群体知识传承、心智训练与伦理教化的必要途径。虽然,教育就其经典涵义而言“是社会将其精神内容和内在形式传递给下一代的过程”,但基于启蒙立场的现代知识界似乎更热衷于将教育视为“一种人格觉醒的事业”。

在哲学层面的启蒙教育观当中,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目的,被视作培养知识广博、教养良好,同时具备现代职业能力与理性批判能力的自由人和公民。如 1945 年哈佛委员会 12 位教授经过两年研究,在呈递给校方的报告《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目标》中指出:“我们的结论是:教育的目的应该是使学生成为既掌握某种特定的职业或技艺、同时又掌握作为自由人和公民的普遍技艺的专家。”独立、自由的人格培育,由之成为现代教育哲学高擎的理念大旗。以培养知识博雅、专业精湛同时独立而自由的现代公民为目标,现代教育作为一门艺术,如 19 世纪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所言,是在追求“一个永久要达到而从来不能充分达到的理想,即完人的理想”。完人,即全面发展的人,本质就是自由的人。完人教育或全人教育,就是把自由视为首要价值的教育——自由教育。

20 世纪初,中国现代学术的奠基者王国维先生即撰有《论教育之宗旨》(1906)一文,阐明了现代全人教育的理念——

教育之宗旨何在?在使人成为完全之人物而已。何谓完全之人物?谓人之能力无不发达且调和是也。人之能力分为内外二者:一曰身体之能力,一曰精神之能力。发达其身体而萎缩其精神,或发达其精神而罢敝其身体,皆非所谓完全者也。完全之人物,精神与身体必不可不为调和之发达。而精神之中又分为三部:知力、感情及意志是也。对此三者而有真善美之理想:“真”者知力之理想,“美”者感情之理想,“善”者意志之理想也。完全之人物不可不备真美善之三德,欲达此理想,于教育之事起。教育之事亦分为三部:智育、德育(即意育)、美育(即情育)是也。

在王国维看来,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必须是精神与身体协调发展的。身体的发展固然需要体育,而精神的发展则主要侧重知、情、意诸主体能力的培育,即智育、德育和美育。于其后才有蔡元培等现代教育家大力提倡“美感教育”。可见,在中国现代教育肇兴之初,美育已被纳入全人教育的理念框架中。

(《哲学动态》2020 年第 10 期《美与自由教育》张俊文)

新时代美育的使命与实践方略

一、美育功能与时代使命

美育作为全面发展教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首先要培养的是学生的“审美与人文素养”。同时,美育还能以美的事物所独具的形象生动性、魅力和感染力有效辅助道德教育,促进学生积极价值观的形成;启迪智慧,激发学生学习与探索真知的欲望;健全身心,疏通经脉和化解心结;驱动行为,以动手劳作表现美和创造美好的新事物。

2018 年 9 月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2019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教育部长陈宝生指出对“美育要有刚性要求”。“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建设文化强国、坚定文化自信,教育是重要阵地,学校美育是重要渠道”。

二、聚焦美育课程与教学

课程是学校教育实现教育目标的主渠道,教学是课程实施的过程与方法。学校教育就是“通过教学来进行教育的”,不存在“无教学的教育”,也不存在“无教育的教学”。

所谓“教学”,有三层含义,广义的教学,包含课程及其实实施过程和方法;中义的教学,指课程的实施过程与方法;狭义的教学,就是指课堂教学。改进学校美育教学,从广义上说,包括美育课程的设置及其教学过程与方法,乃至课堂教学、校园环境建设、管理、评价与制度的改进等。

课程是用知识和价值观铺设的学生发展的跑道,教学就是引导学生如何在这个跑道上奔走的过程与方法。如何用各种美(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科学美、生活美、人格人生美等)的知识与方法,铺设一条促进学生“审美与人文素养”和多方面素养和谐发展的跑道,是美育课程



设置与建设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有步骤地实施各种美育课程并改进课堂教学,实现“准确、有效、美感”的审美化教学境界,是美育课程设置与教学实践方略问题。

三、加强艺术素质与美育质量检测

实施美育质量检测是督促美育落实,监督美育实施水平,推进美育工作和确保学生“审美与人文素养”发展,完成新时代美育使命不可或缺的杠杆。

艺术教育不等于美育,因

此艺术素质测评也不等于美育质量检测。所谓美育质量检测,应该是对学生通过基本美育课程和多样化美育课程及其教学后所得到的发展进行测评。美和美育本身具有形式和内容的多样性,是可以为学生提供高度自由性、个性和创造性的教育。如果仅以音乐、美术素质发展来衡量学生审美与人文素养的发展,且又采用的是几乎与专业音乐和美术素质测评相当的方法来测评,就很容易陷入以粗浅简陋的专业知识与技法来衡量全体普通学生的“陷阱”。如有些学生天生就缺乏视觉的色彩、造型等能力,或者缺乏音乐的节奏感、旋律感,他们的艺术素质测评注定永远不会及格。然而,这就意味着学生不具有审美与人文素养吗?因此,应该将“艺术素质”测评置于“审美与人文素养”的大框架中,作为其中一个测评内容或指标板块来体现。

(《人民教育》2019 年第 6 期《新时代美育的使命与实践方略》赵伶俐 文)

艺术素质测评体系如何构建?

艺术素质测评由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构成,一级指标包括基础指标、学业指标和发展指标;二级指标包含课程学习、课外活动、基础知识等。在教学实践过程中,我们可以把一级、二级指标内容充分融入过程性评价、终结性评价与艺术实践评价中。

过程性评价

过程性评价的“过程”是相对于“结果”而言的,具有导向性。其实,过程性评价不仅关注过程,也关注学生学习的结果,过程为结果服务。过程性评价的价值不仅在于从中学出学生评价等级,更在于从学

生自身发展中找出其艺术成长轨迹,发现成长过程中的问题和不足,这样才能及时地反映学生的艺术学习情况,促使学生对自我学习的过程进行积极反思和总结。因此,艺术素质测评的过程性评价可包含《中小学生艺术素质测评指标体系(试行)》中基础指标,学业指标中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学习及学习过程中的出勤率、参与度和学习任务完成情况。

终结性评价

终结性评价的目的是对学生阶段性学习质量做质性的判断,一方面对学生一段时期内的学习情况给予评价,另一方

面通过评价让学生发现自我的不足之处,为今后的学习扫除障碍。艺术素质测评终结性评价可包含“指标体系”中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里的“理解和掌握艺术课程标准要求的基础知识”“掌握和运用艺术课程标准要求的基本技能”。艺术素质测评中,终结性评价方式主要有课堂教学检测、合作学习评价、终结性测试等。

艺术实践评价

艺术实践评价包含“指标体系”中“发展指标”所涉及的“学生自主参加校外艺术学习、参与艺术实践的情况”和“学生在学校现场测评中展示的某一

艺术项目的特长”。基础教育阶段音乐艺术实践的目的并不在于培养专业人才,而是通过艺术实践活动,提升学生的艺术表现力,让学生在艺术实践中进一步感知、强化与课堂学习内容相关联的知识和技能,增强学习动力与自信心。当然,艺术实践活动也为具备一定艺术素养、努力成为专业音乐人才的学生提供了展示自我、锻炼自我的机会和平台。基于此,教师应不唯分数论、不唯等级论,对学生参与艺术实践持鼓励态度,尽可能让学生积极参与。

(《新课程评论》2020 年第 1 期《艺术素质测评实施现状及策略探究》蒋维 文)

要通过语言文字直抵学生的心灵

一百多年来语文的独立设科历史给我们的启发是很大的。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当时国家积贫积弱,学西洋,先学习枪炮,后要改变人,改变人就要办教育。一些有识之士兴办新学,这是洋学堂的开始。洋学堂要学科学、学计算,许多教材都从西方引进,如数学啊,物理啊,化学啊,这一点不奇怪,也无可非议。但是“中文”外国没有,没办法引进,“中文”该怎么学的问题自然就提出来了。

中文,当时就是“中国文学”,它的定位有两个关键词,一个关键词是实用,给家里要写家书,政府要写公文,表达贵于明达而已;另一个关键词是训练。我觉得当时对“语文”的定位有它的先进性,中国向来文史哲不分家,“中国文学”独立设科后,强调实用和训练,是有价值的。那个时候有人提出,不仅要有工具训练,还要有精神训练,这真了不起!

几十年来,语文教学的目标一直左右摇摆,这对我们语文教师的成长有不良影响。语文学科就像大杂烩,这些年来“字词句篇语修逻文”“八字宪法”一直影响着语文教学的思路。任何一位老师,不论教哪一门学科,都不能定为一尊,人是多样的,什么都标准化,这是不



人民教育家 于漪

行的。改革开放百花齐放,语文教学有各种做法,不是每个人的做法都很科学,因为每个人的力量有限,但是各具特色。个体力量,各有千秋,相互补充,教师这个群体就会产生群体效应,个性得以张扬。

一课一练全覆盖,赚的是家长的钱,害的是孩子的前途,这对我们语文教育的伤害难以言表,育分不育人哪!孩子不断变化,现在看上去的缺点,在成长过程中是会变化的。语文教师要训练自己敏锐的目光,发现每个孩子身上的优点,不能代替孩子成长。比如有个男孩子喜欢捉鱼捉虾,我指导他将鱼虾放到办公室的脸盆里,培养他的耐心。情感是可以转移的,叫“移情”。兴趣也是可以转

移的,我们有了共同语言,情感上不是他靠近我,而是我靠近他。后来他写了一篇文章《乌龟与龙虾大战》,写得很好,但错别字很多。我把他请到办公室面批作文,并印出来在全班讲解,他很受鼓舞。我们要让孩子跟语言文字有感情。教师的工作是铺路、搭桥,培养学生的兴趣,而不能代替学生。学生有了兴趣后,心静下来,才能学得好。离开生活学语文是学不好的,学语文既要读有字书,也要读无字书。语文水平的高低跟认识能力、生活经历、学习积累是紧密联系的。

“双基”,即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当时提出是先进的,这对稳定教育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是有帮助的。但是这

些年来,重求学而不重读书,学生没有文化积淀,怎么写得出好文章呢?读和写很重要。我教书这么多年来,学生作业就两样,课外读书和随笔。我把津贴拿来给学生买书和杂志,一两个月开一次读书交流会。每天上早读课一定是练口,让学生介绍杂志里的文章,有的介绍得非常好。一个初中生读《静静的顿河》,他可以写十几个人的

人物分析,这样的孩子考试根本就没有问题,关键在细水长流的培养。后来的“三个维度”是第八次课程改革。学生在学校受益最多的是知识,能力只有一半受益,求异思维、责任心等完全不成比例,所以才有这三个维度。新时期的课改战略定位对了,以学生为本,以学生的发展为本,回归到教育本质,才有了三个维度,这是针对我们的教育现实情况提出的。其中,过程与方法是我们的弱点,“过程”本身是教育,“方法”是要指导学生学会学习,培养他们的能力。教师应教会学生用两只眼睛看世界,要有责任担当,要有求真的科学态度,要有宽容的、积极的人生态度,使学生健康地成长。这三者是糅合在一起的,现在变成了语文核心素养。

(《语文建设》2019年第17期 于漪文)

教师需要理解学生的生命

教育是关涉生命成长的事业,教育以成全和促进个体生命的成长发展与人类生命的存续发展而生,以实现生命价值为出发点和归宿。学生在教育活动中实现自我的生命成长,并将逐步地将个体的生命纳入到社会文明脉络。教师以教育的实践引导学生的生命成长,同时也是在教育实践中展开自我的生命。教育实践过程需依循生命的生长状态、发展需求和成长规律而展开,对生命理解就成为教育的前提和基石。因此,教师作为生命理解者的角色不是外部赋予的,而是由教育的本质和使命决定的

教师应当把握生命的丰富性和差异性。一切社会实践都以对实践对象的把握为前提,这是实践的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必然要求。在教育实践中,教师所面对的学生不是抽象意义上,也不是平均意义上的学生,而是具有差异性的生命个体。这种差异性体现在学生的禀赋、兴趣、性格,不同的家庭文化背景以及成长轨迹。如怀特海所论,“人的天性各不相同,有很大的差异性……在教育中如果排除差异化,那就是在毁灭生活”。同质化的教育必是泯灭学生个性的教育,也是低效的教育,在本质上是未给予学生生命完整的肯认。教师只有实现对具有个体差异性的学生的理解,才可能通过积极的教育干预来因材施教,促进学生差异化的成长。

教师应当把握生命的发展性和完整性。教育所面对的学生是成长过程中的生命,而生命的成长与发展在时间维度上具有连续性。一切教育行动都是以学生过往生命成长轨迹为背景,立于学生当下生命状态,朝向学生生命的可能未来的。也就是说,教师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当下的学生生命状态,而是要通过对学生当下生命状态的深度理解,以及对学生过往生命历程的用心考察,设想学生未来生命的可能状态,并由此运思如何促进学生生命通向可能之完满状态。教师只有将自己的教育实践建立在对生命发展性的理解基础上,其教育实践才可能是正确有效的。同时,生命成长和发展具有完整性,不能停留在狭隘的肉体上的强健与成熟,也不能停留在知识和技能上的习得与提升,还包括情感和精神上的丰盈与升华,而后者更为隐秘,更为重要。学生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呈现在教师面前,推动着教师不断努力追寻对学生生命的完整理解,促进学生生命的完整发展。

(《教师教育研究》2020年第5期《论教师“生命理解者”的角色及其实现》毛道生文)

我追求成为这样的语文教师

有学问

课堂的魅力就是教师的魅力,而教师的魅力主要就是学识的魅力。教师往讲台上一站,就要让学生感到你有一种源于知识的人格魅力。这种魅力,更多来自于阅读。

只要教师肚子里真的有学问,那么,无论他怎么教,甚至哪怕他“满堂灌”,都叫“素质教育”,都叫“新课改”。比如语文名师钱梦龙,虽然只有初中文凭,但因为善于自学,读了很多书,所以成了学问大家,他的语文课自然就超出一般教师的境界。看钱老师在1980年代的课堂实录,那不是“素质教育”是什么?不是“新课改”是什么?虽然那时还没有这些提法。如果教师肚子里空荡荡的,只会根据教学参考来备课、上课,课堂上必然捉襟见肘。

有思想

这里的“思想”既是动词也是名词——指能够独立思考,并形成自己独到的见解。通俗地说,语文教学就是要教会学生通过语言文字,准确地把握、领悟思想情感,并能够熟练地

运用语言文字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这就要求教师要有自己的思想情感,而不是只会复述教学参考,人云亦云。学生思考的火焰只有用教师思考的火种去点燃。

我们常说要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要做到这一点,那教师自己就必须先是一个独立思考的人。马克思的战友威廉·李卜克内西曾这样评价马克思:“他是一个彻底正直的人,除了崇拜真理之外他不知道还要崇拜别的,他可以毫不犹豫地抛弃他辛辛苦苦得到的他所珍爱的理论,只要他确认这些理论是错误的。”我认为,教师也应该拥有这样一种追求真理、崇尚科学、独立思考的人文精神。实在无法设想,一个迷信教材、迷信教参的教师会培养出富有创造精神的一代新人。

有情趣

有的语文课,重点突出、条理清楚、知识准确,但就是枯燥沉闷,学生不喜欢。这样的课让人说不出什么问题,但总觉得哪里不对劲。细想起来,是因为这样的课少了一点情趣。

多年来,我们研究思考教

育教学,往往是站在成人的角度,或者说是站在教师的角度,而忘记了“儿童立场”——即要符合儿童的特点,站在儿童的角度来设计教学。

我曾对“什么是好的教育”有过通俗的解说,就是“既有意义又有意思”。所谓“有意义”,是站在教育者的角度说的;我们的责任、使命、理想,我们的教育目的,我们所要传递给学生

有才气

在担任校长时,我经常对我校语文组的老师说:“如果放在过去,你们都是文人,而文人就应该有文人的才气。现在人喜欢说某位会写文章的人是‘才子’,或‘才女’。其实,语文教师人人都应该是才子或才女。”

我现在依然坚持这个说法。在我的心目中,语文教师就应该是才华横溢的人。说到这里,我想到我中学时代的喻仲昆老师。喻老师能把那个年代

枯燥的、毫无文采可言的文章讲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他还写得一手好字、一手好文章,还有一副好口才,我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虽然喻老师已去世多年,可我至今还珍藏着他40多年前给我批改过的作文。

有胸襟

这里说的“胸襟”,是一种尊重、平等、宽容的气度。也就是说,所谓“有胸襟”,指的是语文教师应有的民主教育的情怀。

毫无疑问,民主教育不能仅仅由“语文”来承担,而应该是所有学科的共同任务。但语文作为“发展儿童心灵的学科”(叶圣陶语),在民主教育中所起的特殊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给教育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教育——这首先是人学。”而语文,正是一门解放心灵、唤醒自我、发展个性的“人学”。因此,“人”——人的思想、人的感情、人的精神提升、人的个性发展,应该是语文教育的生命。而教师是否真正有胸襟、有情怀,就在于他能否尊重学生心灵的自由。

(《同舟共进》2020年第12期 李镇西文)

全球数字素养与能力标准框架

2019年3月22日,“数字智能联盟”(Coalition for Digital Intelligence,简称CDI)在第七届“全球教育和技能论坛”(Global Education and Skills Forum,简称GESF)上发布《2019年DQ全球标准报告》(DQ Global Standards Report 2019),该报告首次尝试为教育和技术领域的数字素养和能力制定可实践的全球标准。

DQ框架是一套综合技术、认知、元认知和社会情感能力的框架标准,其基础是普适的道德价值观,使个人能够面对挑战并把握数字生活所带来的机遇。DQ整体框架首先提出了涉及数字素养能力的8个领域,包括数字身份认同、数字使用和数字安全等,这8个领域还能通过三个不同的维度(数字公民、数字创造力、数字竞争力)进一步细分,形成由24种数字素养能力组成的8乘3矩阵,该框架涵盖与数字素养相关的知识、技能、态度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内容,如表1所示。

数字素养维度。围绕纵向类别,DQ将数字素养由低到高划分为3个能力维度。其中,第一层次为数字公民,是指以安全、负责以及合乎道德的方式使用数字技术和媒体的能力;第二层次为数字创造力,指成为数字生态系统的一部分的能力,要求个体具有创造新知识、新技术和新的内

表1 DQ 数字素养能力框架表			
维度领域	数字公民	数字创造力	数字竞争力
数字身份认同	数字公民身份识别	数字联合创始人身份识别	数字变革者身份识别
数字使用	平衡使用技术	健康使用技术	文明使用技术
数字安全	网络行为风险管理	网络内容风险管理	商业和社区网络风险管理
数字安保	个人网络安全管理	网络安全管理	组织网络安全管理
数字情商	数字同理心	自我意识与管理	关系管理
数字交流	数字足迹管理	线上交流与合作	公共与大众交流
数字扫盲	媒介与信息素养	内容创造与计算素养	数据和人工智能素养
数字权利	隐私管理	知识产权管理	参与式权利管理

容,并将想法转化为现实的能力;第三个层次为数字竞争力,这是最高层次的数字素养,是指能够在数字经济中,通过创业、就业、促进社会增长以及提升影响力等手段,解决全球挑战,进行创新以及创造新机遇的能力。3个维度方面体现了在不同领域中数字素养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其中,数字公民是对公民数字素养的最基本要求,而数字创造力则对数字素养能力要求进行提升,要求新知识内容的创造,数字竞争力则将公民的数字素养提升到社会和全球层面,具有数字领导者的特征。

数字素养领域。围绕横向类别,DQ将数字素养分为8个领域,这八个领域的具体内容如下:

数字身份认同,指建立健康的在线与离线身份的能力,其指导原则为尊重自己;数字使用,指以平衡、健康和文明的方式使用

技术的能力,其指导原则为尊重时间和环境;数字安全,指通过安全、负责任和有道德地使用技术来理解、减轻和管理各种网络风险的能力,其指导原则为尊重生命;数字安保,指检测、规避和管理不同级别的网络威胁以保护数据、设备、网络和系统的能力,其指导原则为尊重财产;数字情商,指在人与人之间的数字互动中,能够识别、引导和表达情感的能力,其指导原则为尊重他人;数字交流,指使用技术与他人沟通和合作的能力,其指导原则为尊重声誉和人际关系;数字扫盲,指发现、阅读、评价、综合、创造、适应和共享信息、媒体和技术的能力,其指导原则为尊重知识;数字权利,指在使用技术时理解和维护人权和法律权利的能力,其指导原则为尊重权利。

(《图书馆建设》2020年8月20日网络首发 王旭燕 文)

荷兰中小學生数字素养框架

2013年,荷兰国家课程发展研究中心代表荷兰教育、文化和科学部厘清了数字素养的概念:数字素养是一组基本的ICT技能、计算思维、信息素养、媒体素养的知识、技能与态度。2017年,国家课程发展研究中心发布了数字素养的学习框架,涵盖“基本的ICT技能、计算思维、信息素养、媒体素养”四个实质性领域。2019年,数字素养开发团队发布《数字素养学习领域》,呈现了进一步的完善的数字素养学习框架,阐释了学生在各学段要掌握的知识、技能和态度的学习目标。

基本的ICT技能。基本的ICT技能是学生掌握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基本功能,能够利用各种现代数字技术实现数学逻辑运算和信息处理。基本的ICT技能的要素有:(1)掌握ICT的基本概念,识别和理解计算机、互联网、软件应用程序、数字技术的基本知识与功能;(2)使用互联网基础设备,识别和连接基本的硬件设施设备,使用设备和程序进行访问、存储和共享信息;(3)有效应用标准办公应用程序、软件应用,如文字处理器、演示软件、图像和视频编辑;(4)具有信息安全与隐私意识,安全使用互联网信息、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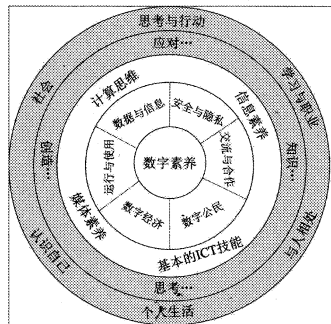


图 荷兰中小學生数字素养学习框架

线交易,并意识到个人和他人的信息安全和隐私。

信息素养。信息素养是学生能够确定和分析信息的来源,系统地进行数字信息的检索并批判地选择,能够评估信息的可靠性与可用性。信息素养的要素有:(1)确定与(研究)问题相关的信息;(2)制定信息检索策略,从可能的信息中选择最具可行性的来源,并能根据实际需要动态调整;(3)获取和选择信息,通过检索获得信息、资料,选择可用的、可靠的信息;(4)信息处理,运用文本、表格等方式对可用信息整理、归类,分析与整合;(5)呈现信息处理的结果;(6)评价,能够对任务过程和最终结果的相关性、有用

性和有效性进行评价。

媒体素养。媒体素养是在社会媒介化的背景下,学生具有媒体意识、媒体智慧,能批判地看待自己、他人的媒体行为;积极地、负责任地使用媒体,涉及安全和隐私的媒体行为能够合乎社会规范。媒体素养的要素有:(1)理解社会的媒体化,洞察媒体对个人、社会、文化等方面产生的影响;(2)理解媒体的社会功能,意识到媒体在传播社会规范和社会价值中如何发挥作用;(3)融合媒体素养,ICT基本技能和信息素养,在使用媒体时,能够操作设备、软件 and 应用程序,保护隐私与安全;(4)创建媒体信息;(5)社会媒体参与和身份意识。

计算思维。计算思维是学生基于计算机的算法、程序和计算能力,以及ICT技术的支持,从确定问题、收集资料和信息到分析、呈现结果的一种思维过程。计算思维为培养学生的过程思维赋能,强调以计算机算法思维思考,利用数字技术和工具寻求解决方案,最终解决问题。

(《比较教育研究》2020年第2期《荷兰中小學生数字素养学习框架与实施路径》魏晓梅文)

《世界教育信息》:您认为应该如何在普及数字素养的同时应对伦理问题?

席酉民:广义上讲,伦理是公民教育包含的内容,包括唤起个体的责任和权利,了解并明确自己的存在和生活方式与社区、国家乃至全球的关系和意义。具体到数字化层面,学校需要更加关注学生在数字时代的公民教育,包括预防网络欺凌,保护数字隐私和数字安全,引导学生明确自己在网络空间中的权利与义务,使其学会保护隐私和名誉、管理好网络足迹等。

加拿大数字与媒体素养中心发布的《数字素养教育框架》将数字公民教育作为数字素养的核心,其中包括七大能力。一是伦理与同情,指学生在数字环境中面对网络欺凌、分享信息、获取音视频版权问题时,可以进行相关道德判断并做出科学的选择。二是隐私与安全,指学生在线管理隐私、声誉和安全的基本技能。三是社区参与,指学生理解他们作为数字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在网络空间中遵循社会规范,并积极参与网络空间的社区活动。四是数字健康,指学生可以管理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平衡网络和现实生活,了解健康信息和有害信息的差异,保护自己的在线身份。五是消费意识,指学生能够在高度商业化的网络环境下树立正确的消费意识,阅读并了解网站服务条款和隐私政策的含义,以建立正确的网络消费观。六是搜索与确认,指学生可以通过互联网有效搜索到自己所需的各种信息,并评估和验证所获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七是制作与整合,指学生可以创建数字内容,并在尊重法律和道德的前提下借鉴、使用他人发布的内容;同时,能够利用数字和网络平台与他人协作,实现内容的整合与创新。

对于大学生的数字素养的培养,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培养合格的数字公民,让学生可以更自在地在数字环境中生活、学习、沟通等,而不仅是教授信息技术。这样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在所有课程中融入数字素养,加强数字素养与各学科间的互通。

《世界教育信息》:您认为应该怎样进行数字素养教育方面的课程建设和教学?

席酉民:目前,我校建立了全球数字公民教育中心,关注提升学生的数字素养,帮助他们获得学习上的成功,并且成为一名有责任心的数字公民。中心已开发

培养负责任的数字公民

访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席酉民教授

并制定了《西交利物浦大学学生数字素养培养框架》。该框架明确了在数字化时代学生学习、生活和未来工作所具备的能力和态度。不同于简单的技术维度或者相关专业知识,该框架更加强调跨专业的、通用的、与日常生活和未来就业息息相关的学习和探索能力。



图 西交利物浦大学学生数字素养培养框架

同时,我校的数字公民教育体系将与现有的所有课程紧密结合,培养框架将作为一个指导性参考方针,体现在未来新开发的课程和专业中,数字素养将作为新课程和专业培养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了在前面阐述过的学生应具备的数字素养,西交利物浦大学的数字素养教育还融入了未来人才必备的批判、创造性思维,问题解决及创新能力。全球数字公民教育中心将在数字化时代的背景下,促使学生进一步思考将数字化技术作为解决问题的工具,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和跨学科能力。

(《世界教育信息》2020年第8期《世界教育信息》编辑部 文)

中国文化面临哪些挑战? 人类文明出了哪些问题? 著名学者费孝通纵论中华文化与人类的未来。

◎书摘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节选)

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

任何民族的生息繁殖都有其具体的生存空间。中华民族的家园坐落在亚洲东部,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东南是海,西南是山的这一片广阔的大陆上。这片大陆四周有自然屏障,内部有结构完整的体系,形成一个地理单元。这个地区在古代居民的概念里是人类得以生息的、唯一的一块土地,因而称之为天下,又以为四面环海所以称四海之内。这种概念固然已经过时,但是不会过时的却是这一片地理上自成单元的土地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

民族格局似乎总是反映着地理的生态结构,中华民族不是例外。他们所聚居的这片大地是一块从西向东倾侧的斜坡,高度逐级下降。西部是海拔4000米以上的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东接横断山脉,地势下降到海拔1000~2000米的云贵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其间有塔里木及四川等盆地。再往东是海拔千米以下的丘陵地带和海拔200米以下的平原。

东西落差如此显著的三级梯阶,南北跨度又达30个纬度,温度和湿度的差距自然形成了不同的生态环境,给人文发展以严峻的桎梏和丰润的机会。中华民族就是在这个自然框架里形成的。

多元的起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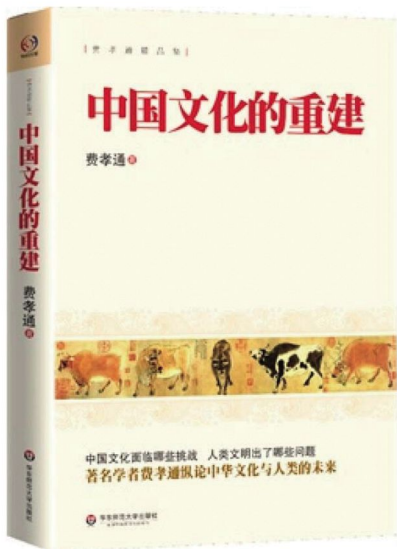
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最早的情况是怎样的?这个问题涉及到中华民族的来源。任何民族都有一套关于民族来源的说法,而这套说法又常是拿来支持民族认同的感情,因而和历史上存在的客观事实可以出现差错。关于中华民族的起源过去长期存在着多元论和一元论、本土说和外来说的争论,直到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70年代以来,由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我们才有条件对中华民族的早期历史作出比较科学认识。

在中华大地上已陆续发

现了人类从直立人(猿人)、早期智人(古人)、晚期智人(新人)各进化阶段的人体化石,可以建立较完整的序列。这说明了中国这片大陆应是人类起源的中心之一。

这些时代的人体化石又分布极广,年代最早的元谋人(距今约170万年)是在云南发现的。其他猿人的化石已在陕西蓝田县、北京周口店、湖北郧县及郧西县、安徽和县有所发现。生活在10万至4万年以前的古人化石,已在陕西大荔县、山西襄汾县丁村、山西阳高县许家窑、辽宁营口金牛山、湖北长阳县、安徽巢县及广东曲江县马坝等处发现。生活在距今4万至1万年以前的新人化石已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山西朔县峙峪、内蒙古乌审旗、辽宁建平县、吉林延边州安图县、黑龙江哈尔滨市、广西柳江县、贵州兴义县、云南丽江市、台湾台南县左镇有所发现。我列举这许多地名的目的是要指出在人类进入文化初期,中华大地上北到黑龙江,西南到云南,东到台湾都已有早期人类在活动,他们留下了石器。很难想象在这种原始时代,分居在四面八方的人是出于同一来源,而且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长期分隔在各地的人群必须各自发展他们的文化以适应如此不同的自然环境。这些实物证据可以否定有关中华民族起源的一元论和外来说,而肯定多元论和本土说。

即使以上的论断还不够有说服力的话,考古学上有关新石器时代的丰富资料更有力地表明中华大地上当时已出现地方性的多种文化区。如果我们认为同一民族集团的人大体上总得有一定的文化上的一致性,那么我们可以推定早在公元前6000年前,中华大地上已存在了分别聚居在不同地区的许多集团。新石器时期各地不同的文化区可以作为我们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起点。



《中国文化的重建》
费孝通 著
定价:38.00元
出版社: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4年1月

◎名人评论

他们(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瞿同祖等)都是这些学科在中国历经沧桑的见证人,正是由于他们的共同努力才使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民族学和人类学在当今社会得以发展和壮大。

——冰心

费孝通这个人样样通,近年来深入农村、工矿,使他更通了。他的名字就有一个通字么……费孝通是走江南谈江南,走江北谈江北,希望现在的青年人也能如此。

——梁漱溟

费孝通长寿,逝于2005年,晚年名满天下。他年轻时英俊清瘦,入中年后则胖硕开朗,能写一手好律诗,做起学术文章来却是如孺能懂,举重若轻。我曾在1997年访问过费老,面对后辈小生,他不厌其烦,耐心以对,反复说的一句话正是,“农民和农村的问题解决了,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日后,每当谈论农村问题,我总是不由自主地会自问,“费老会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吴晓波

◎作者简介

费孝通(1910—2005),汉族,江苏吴江人。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我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第七、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委员会副主席。曾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学院等多所大学教授。1980年费孝通获国际应用人类学会马林诺斯基名誉奖,1981年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奖章,1982年被选为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荣誉院士,1988年费孝通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同年费孝通获《大英百科全书》奖。其主要著作有



《美国人的性格》《乡土中国》《江村经济》《生育制度》《中国乡绅》等。

◎阅读多棱镜

重返费孝通思想的历史视野

费孝通晚年对于文化的思考在中西古今的交汇点上提升了中国社会学的人文品质和学术品格,并将中国社会学的历史想象力植根于中西古今的社会文化与思想史传统之中。费孝通强调要研究一些关于“人”“群体”“社会”“文化”“历史”的基本问题,而这些基本问题恰恰体现和贯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和核心要义。

费孝通以“人”的研究为例,区分了中西思想传统中对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的不同理解。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天地人神构成了人的基本生存境遇。“人”的研究必然包含诸多层次,如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神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我与我的关系、人与自身精神世界的关系,即人与心的关系以及心与心的关系。其中,人、自然、社会具有复杂的关联性。人的生物性作为人的自然属性,是与人的社会性相互包容的;而社会的存在与演化都是广义的自然的一部分。因此,自然与社会并非二分的概念。将人置于自然的背景中来看,人和自然也是合一的,而作为人类存在方式的社会,也可谓自然的一种表现形式。由此,人、自然与社会在中国传统思想中都是合一而非分离的概念,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应该是我们定义“人”“自然”与“社会”的基本原则。但是,近代以来受到西方现代科学的影响,中国传统思想中“天人合一”的价值观受到冲击。中国历史社会学需要在中西思想文化相互影响、交融与激荡的脉络中,重新寻找传统思想变迁与延续的思想史轨迹,由此重新建构社会学的历史想象力。

费孝通强调,理学是“中国文化的精华和集大成者,实际上是探索中国人精神、心理和行为的一把不可多得的钥匙”。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心”“神”“性”等问题,需要我们超越现代主流社

会学研究方法的制约,在实证主义思路之外另辟蹊径,努力寻找与中国传统“理学”思想进行交流的手段。

进而,费孝通从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的关系问题,引出了人的群体性、文化性和历史性的问题,并强调文化性和历史性是人与人的生物性密切相关的两个不同概念。费孝通认为,社会中的人,具有社会性和生物性的双重属性,而社会得以长久存在,正是因为文化的作用。基于人的群体性即社会性,文化才能发挥作用。文化具有跨越时间、跨越空间、跨越个体生命的历史性,具体的知识和技能可以在历史的长河中积累传承,更为深刻与抽象的东西如认识问题的方法、思维方式、人生态度等,也是伴随文化而传承的。也就是说,文化的传承实际上包含着社会的传承,社会的运行机制、社会结构等都是随文化传承的。因此,中国文化注重历史性,“中国是一个有祖宗和有子孙的社会,个人是上下、前后联系的一环”。正是基于这样的连续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研究社会也好,改革社会也好,决不能抛开历史,没有一个社会结构是完全凭空构建的,它总是要基于前一个社会结构,继承其中的某些要素,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东西”。

费孝通基于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深刻理解和思考,意识到并特别强调历史是具有延续性的,它不会决然断裂或完全终止,也难以亘古如斯。中国历史社会学的研究要在这种具有传承性和延续性的历史文化传统中,洞察历史长河中思想传统与社会意识的延续与断裂、传承与接续、变迁与融合,在历史的罅隙中窥见变与常,体会民情与民心,获得对当代社会现象的历史性理解,感知和体察传统社会的世变、心态与秩序。

(《中原文化研究》2020年第6期 周丹丹 李若晖 文)

《学记》的大教育制度观

《学记》在考查先秦教育制度和教育实践的基础上,托古言今,提出了建立一个从地方到中央的统一学校制度的设想,即“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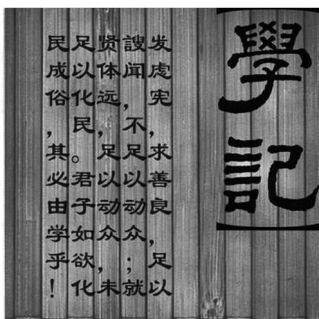
这个设想的要点有二:一是学校应按家、党、术、国的行政区划和级别来分层分级设立,二是不同的级别的行政区划设立塾、庠、序、学等不同性质和类型的学校。

《学记》关于教育体系的这个设想隐含了以下一些大教育主张:

第一,分级办学,分级管理。家、党、术、国,各办各的学校,各管各的学校。汉代以后,就逐渐形成了中央官学与地方官学并重的办学体制。

第二,普及教育。不同层次的行政区划,都应该举办相应教育机构。每一个“家”(间/里)都要兴办“塾”,每一个“党”都要兴办“庠”,每一个“术”(遂)都要兴办“序”,每一个“国”都要兴办“学”。

第三,分类教育。塾、庠、序、学,各有分工,各有侧重。按照孟子的解释:“庠者,养也;校



者,教也;序者,射也。”“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

(《孟子·滕文公上》)意思是说,“庠”是养育,“校”是教

育,“序”是学习射箭或军事体育教育。而“学”这个名称,夏、商、周三代都有,都指的是教人明人伦。《学记》实质上提出了分类教育的思想。

第四,分层教育。塾、庠、序、学,不仅是类别的差异,更是层次的差异,反映了《学记》希望建立一个从低级到高级、阶梯上升的学校系统的思想。虽然这种设想在当时没有完全得到实施,但我们今天的教育是分为幼儿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虽然我们今天的学校系统是从西方流

传而来的,但也说明人类教育思想的相通性。

第五,教育事业的发展,与人口密切相关,不同级别和类型的学校,服务的人口和对象不同。家、党、术、国,分别由不同的户数组成。据《周礼》记载,百里之内二十五家为间;五百家为党;一万二千五百家为遂(术)。因此,塾、庠、序、学服务的对象是不同的,其办学规模也是不一样的。

(《社科纵横》2015年第3期《当代大教育视野下的〈学记〉研究》王正中 文)

教学的时间逻辑

《学记》中不仅设想了长达十六年的“课程计划”,强调了教育时间“节点”意义,在教学与时间的关系上也有深刻而精到的总结。中国哲学中也把时间看作是复杂的、非均匀的过程,即时机。关于《学记》中教学的时间逻辑大致可分为:作为次序来讲的“时”,以及作为时机来讲的“时”。

作为次序来讲的“时”

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及其久也,相说以解。不善问者反此。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始驾者反之,车在马前,君子察于此三者,可以有志于学矣。

问答法是《学记》中总结的教学方法之一。作为“善问者”教师的提问要有技巧,其技巧在于“先其易者,后其节目”之次序,易言之,教师要按照从易到难的先后次序向学生发问,促进学生思考。随着多媒体技术应用的推广,课堂教学中图片多了、音频视频多了、问题少了,留给学生进行思考的时间少了。教学技术的应用是为了服务教学目标的,大数据、互联网时代新的教学技术手段的应用可以与传统的问答法结合起来,突出课堂教学中的问题意识,引发学生的深度思考,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冶铁良匠在传授儿子冶铁手艺人前,往往先教他学做鼓风裘;制弓良匠在传授儿子制弓技艺前,往往先教他编箭袋;训练小马驾车会先让小马跟着车跑。《学记》用了三个类比来阐述了教师开展教学活动的次序,认为对于教学活动次序的省察是“志于学”的前提。但《学记》中对教学次序的理解并没有局限在先后次序的简单层面上,试看“教学相长”一章。

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

从句意上分析,“教”“学”的主体是同一个,故而可认为“教”是学生“学”的一项教学实践活动。在向“至道”求学的路上,学习者的“知”(“学”)与“行”(“教”)是相互促进的,是统一的。学习者“学”与“教”的次

序不是单次的,而是前后相继螺旋上升以促进学生的学业发展。

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不学杂服,不能安礼;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脩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是以虽离师辅而不反也。

作为时机来讲的“时”

大学之法,禁于未发之谓豫,当其可之谓时……

发然后禁,则扞格而不胜;时过而后学,则勤苦而难成;

“当其可之谓时”之“时”,可以理解为儿童发展的关键期。关键期未到,即“未发”时要“禁”。“禁”即无为,学生不学,教师不教(“问”“语”),这与前文“大学始教”之时,“时观而弗语”“幼者听而弗问”恰相吻合,刚入大学,不当其“时”,故教师只“时观而弗语”,“幼者”只“听而弗问”。《论语》有所谓“君子三戒”,“戒”与“禁”意相近,孔子所言君子三戒可为“禁于未发之谓豫”之注脚。如果关键期到了,即“发”后还“禁”,自然会遭到学生的抗拒,正如学生处于青春时期要适时适度地开展爱情教育和性教育,宜疏不宜堵,否则只会“扞格而不胜”。而如果错过了关键期,即“时过而后学”,便会“勤苦而难成”,事倍而功半。

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

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

“喻”为教法之善,即启发诱导。“能博喻,然后能为师”,《学记》认为“博喻”“善喻”是教师的必备素质。教师既要做到“道”“强”“开”,还需不“牵”“抑”“达”,如此“善喻”之火候、时机怎样把握?孔子或许早就作了解答,二程进一步阐发,“学者须是深思之,思之不得,然后为他说便好。初学者须是且为他说,不然非独他不晓,亦止人好问之心”。孔子以“躁”“隐”“瞽”之说论及君子说话的时机和分寸,可与《学记》所述“善喻”之时机的把握相印证。

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

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必也其听语乎!力不能问,然后语之。语之而不知,虽舍之可也。

前文“幼者听而弗问”,何时间呢?当其可时再问。《学记》中不仅要求教师要“善问”,也鼓励学生发问,“善学者”必善问。“善问”之问,有理有节、问到点子上,恰好反馈给教师以信号——其正处于“愤”“悱”之状态。面对学生的发问,教师要“善待问”,怎样才算是“善待问者”呢?《学记》中以“钟”喻教师,学生是敲钟人。学生如“小叩”,问的问题浅显,教师则“小鸣”,简单答一答,点到即止;学生如“大叩”,问困难的问题,教师则“大鸣”,深入讲一讲。面对学生的发问,教师不急尽说,而要“听语”,要留给學生思考和表达的时间,学生“力不能问”,然后“语之”,若“语之而不知”,教师并非放弃学生,而是暂时不往下讲,留给学生思考的时间,另择时机教学。做“善待问”的教师,需要高超的教学技巧,而这一技巧就是“听语”后答问时机和分寸的把握,而不是“多其讯言”。以“钟”喻教师绝不是否认教师的主导作用,而是意在强调教师要灵敏敏锐地把握教学的时机。

(《全球教育展望》2019年第1期《论〈学记〉中的“时”》李想文)

《学记》何以建国君民?

《学记》承继儒家对君子的为政教育,把“官先事,事先志”列为“大学教育”的总纲,是为了使君子在面对和处理具体政务的过程前树立德政志向,以“道”引导和匡正政治实践活动。这样的人在大学受到王道教育,可以为师,以培养王道政治的接班人;可以为官,以践行王道。

更进一步,君主统治也只有放在王道政治的统绪中才有正当性。这就是《学记》“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的政治意涵。如《荀子·礼论》所说,“君师者,治之本也”。君师乃“治之本”的看法源出于道,君和师“应当”是德政的传承者和践行者,这当然是儒家为了保障政治正义的理想设定,继而衍生出“道尊于势”“教优于政”的精神传统。关于师、教和道、政的关系,章学诚言:

三代以前未尝以道名教,而道无不存者……盖自官师治教分……而立教者可得离法而言道体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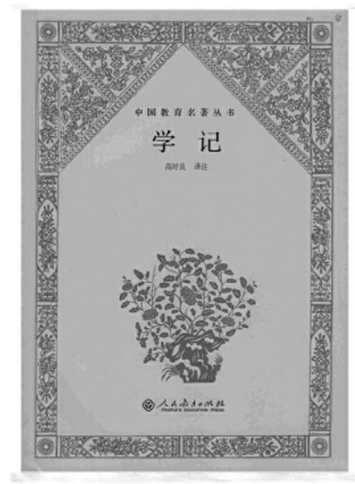
这是儒家对历史哲学的典型看法:三代以前为黄金治世,道统、治统合,道存于官,官通于师;三代以后道统、治统分,官、师分途,以“学”存道,道存于“师”。由此而师尊于君,尊师者,尊道也。君王依“师”学“道”,因而有所谓“师者不臣”:《学记》云“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吕氏春秋·尊师》云天子不以“师者”为臣,“所以见敬学与尊师也”。以学传道,教优于政,凡此即为中国文教精神之所在。因而先有贾谊云:“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再有韩愈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师说》)。

与秦朝专用文吏、二世而亡不同,继起的汉朝转而招纳儒生。儒生与文法吏的区别,王充曾做辨析:“儒生所学者,道也;文吏所学者,事也……儒生治本,文吏理末。”又云:“文吏以事胜,以忠负;儒生以节优,以职劣”。王充对儒生与文吏的异同辨析主要是从道(本)与事(末)着手的。文吏奉行律令,以“优事理乱”为己之所务,长在政务执行;儒生以道自励,“君子不器”,所学所习为仁义之文,古今之学,往往能坚守政治道义和德性气节。

随着儒学日益上升为政治显学和国家意识形态,一方面,学者兼官僚的新型角色成为政坛主导,使得中华帝国由文吏政制转轨为士大夫政制;另一方面,也使古代中国的政治形态从“纯任法治”转型为“儒法兼综”,成为一个奉儒家学说为合法性基础,同时采用法家建制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这两个方面正是大一统局面在两千多年得以维持的关键。

不难看出,在这个过程中,儒家教育的官学定位和建制化发展起到了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以此为前提,儒家君子方能以礼乐维系社会道德;才有与选官制度相结合的士大夫以道抗势,维护政治正义。它们是理解《学记》提出“化民易俗”和“建国君民”教育目的的生生源头。

(《教育研究》2020年第11期《重申周秦变局下的〈学记〉教育目的论》刘娟 文)



党委书记和校长治校理念存在差异的原因

党委领导下的 校长负责制的政策背景

政府对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政策文本的不断颁发和完善,充分说明和解释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内容,提供了相应的政策基础。具体而言,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可分为三方面:第一,党委书记在高校中是绝对领导核心,也是实际政治权力的关键人物,具体把握和统筹高校办学方向和今后的发展方向;第二,大学校长是我国大学的法定代表人,也是大学行政权力的最高代表;第三,必须保证双方的界限区分,同时在保证党委的领导作用得以很好发

挥下,又要支持校长能够积极行使自身的职权,更好地促进高校的各项发展。在此政策背景下,校长与党委书记的分工明显是不同的,但并没有明确校长与党委书记的职能界限,这造成了双方职能的重叠,而这样的重叠又恰恰是自身理念的反映,先理念后行动,所以出现了治校理念的重叠现象。

党委书记 与校长工作背景的不同

虽然大学党委书记和校长都是高校的核心领导群体,但其主要的工作背景有着较大区别。党委书记为政府服务,政府对大学的监督和支持活动主要依靠党委书记,通过及时对接和反馈

获得高校的需求。党委书记作为高校党委的核心人物,表明党委书记是高校重大事项或问题表决中最重要的决策者之一,同时也包括直接管辖高校下级组织的管理权。对于我国大学的党委书记而言,基本上都是官员出身,所以会影响其治校理念的形成,使得其治校理念更注重党建事项以及与政府、社会的沟通联系。而大学校长作为大学行政第一把手,更多的是聚焦于大学内部事务或学校具体发展建设工作。党委书记把握高校有关宏观性的大方向的问题,而校长则需



图片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要领导管理学校内部具体细微的日常工作。

党委书记与校长 个人理念认知存在异同

大学党委书记和校长是高

校政治、行政的“第一把手”,其工作背景、工作内容、政治忠诚度,作为教育事业工作者的专业学科素养或者是基本的为人处世的道德品质都能直接或间接影响到自身理念上,进而直观反映到大学的治校理念上。通过分析收集到的问卷,可以发现党委书记在高校中扮演不同角色,但党委书记多是选择教育家和政治家作为自己的突出角色;高校校长更多的是以擅长管理的教育家的角色来定位自己。对自己自身定位的不同,也就使得对于大学治校理念的偏重会有所差别。

(《现代教育管理》2020 年第 9 期《协商治校语境下大学党委书记和校长治校理念的实证分析》凌健 许益 文)

谁在担任 我国一流大学的校长?

第一,校长群体的构成趋于“同质化”。通过对 42 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校长个体特征的分析,可以形成这一群体的总体“肖像”。绝大多数校长都是男性,以汉族为主,拥有中共党员身份,任职年龄都在 50 岁以上,全部拥有博士学位,大多具有理工科背景,职称都是教授,并且担任博士生导师。

第二,校长的选任以学术精英与高端人才为主。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校长在任现职之前就已经获得多种学术头衔与荣誉,包括获得过院士头衔或入选过高端人才计划,成为本领域和行业的知名专家与领军人才,体现出“学而优则仕”“专家治理”的特征。同时,大学校长还承担着多重社会角色,包括在政府部门担任领导职务,成为专业协会的负责人等。

第三,校长的选任来源呈现出“土著”特征。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校长的选任存在着倾向于本校毕业、有本校工作经历的趋势,本校毕业的校友担任校长职位的比例超过 40%,在本校工作过并担任校长职位的比例超过 50%。地位层次越高的高校,在校长选任上越具有明显的“土著”特征,体现出校友资源的强大影响。位于地方省份的高校,在校长的选任上还呈现出本省人的倾向。

第四,校长职位的变迁路径比较“唯一化”。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校长的职位变迁都是从普通教师开始,逐步晋升到院系领导和行政部门领导,最后升任到校级领导,其职位变迁路径比较“唯一化”。校长职位的校际流动通常会受到高校层次、类型的影响,主要是在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以及类型相似的高校之间进行流动,层次较低大学的校长向上的流动比较困难。

(《中国高教研究》2019 年第 4 期《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校长任职的实证分析与启示》白华 文)

党委书记与校长存在履职职能重叠现象

通过对 115 所“211 工程”大学网站的新闻挖掘分析,可以发现大学校长与党委书记在九个具体的行政事务领域存在着较为明显的职能重叠现象,党委书记在大学治理实践中较深地介入了校长治校的具体过程,甚至在一些具体的行政事务领域与校长的职能几乎重叠。这一研究结果呈现出,在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一大学校内领导体制下,党委书记与校长在治校实践中的真实状态。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校长与党委书记的职责划分不够清晰、职责分工刚性化不够,客观上反映出我国高校校内领导体制有待进一步完善。但是,仅仅从二者职责分工不明确的角度很难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从逻辑上说,在分工不明确的制度环境

中,党委书记完全可以对原则上不属于自身职责范围的事情“不闻不问”,甚至可能出现相互扯皮的现象,可为什么一些党委书记依然“热衷”于具体的行政事务?

事实上,在我国特有的大学制度体系中,党委书记和校长共同出现在同一场合、共同推动某一事务的过程恰恰反映了该事务的重要程度,党委书记的参与是对该事务的重视和对校长表达支持的重要方式。而在中国现有的大学治理模式中,党委书记和校长的共同参与对于行政事务的有效推动和落实无疑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大学规模和内部组织结构的不断扩大,在面对一系列复杂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同时,治理一个如此复杂的机构,难度可想而知。中国的大学治理面临着越来越



图片来源:搜狐网

多的挑战,很多行政事务如果离开党委书记的参与,可能产生更大的负面效应。例如,校长和党委书记都表现得最为积极的“对外交流与合作”“教学科研与人才培养”“思想教育与学生管理”等事务均是当前我国大学治理中需要高度重视和着力解决的问题。从这一角度来说,校长和党委书记在具体行政领域中的“职能

重叠”恰恰反映了大学党政关系和谐,党政合力实现大学有效治理。

校长和党委书记之间的职责分工和权限划分,有时候很难泾渭分明、一清二楚,两个人工作中的相互尊重、默契配合、互相补台,就极为重要。我们需要深入反思的是,在校长和党委书记共同参与、形成工作合力的同时,如何避免可能存在的统揽和包办代替的误区,更加充分地尊重和发挥校长在治校方面的权能。让校长有负责的动力、负责的权力和负责的能力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需要完善校长管理相关的制度体系。

(《复旦教育论坛》2018 年第 2 期《大学党委书记和校长在履职实践中的职能重叠现象分析》钟伟军 杨则扬 文)

技术治理下大学校长领导力的困境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国家治理逻辑已经从总体性控制向技术治理转变,在实现管理目标时,管理越来越倾向于采用技术治理的手段。政府行政权力科层制内生的“行政内卷化”与“项目制”的合力给大学校长领导力带来困扰。

首先,大学内部组织结构采用科层体系内部的条块分割模式,不同部门分管不同的职能分工,部门之间有明确的界限,部门内部有清晰的层级。在知识经济时代,这种设科分层的组织刚性和大学事

务的复杂性之间存在弹性张力,尤其是当前高等教育场域“项目制”技术治理模式的盛



图片来源:网络

行,导致大学各部门在面对各种临时项目时各部门协同作战能力低下,经常出现临时拼凑的状况。

其次,科层制的封闭性使得大学不太适应瞬息万变的外部环境,各部门缺乏与社会及各行业信息的互通互融。大学校长需要亲自出面应对来自外界的各种“行政包”项目,并将这些项目分解至各职能部门,使得科层制基于其层级明晰和高度封闭所带来的高效率受外力影响,科层主导的合作治理变得软弱无力,不再

合理高效。

再次,经济社会的转型要求大学治理主体多元化,虽然政府表面上不再对大学进行直接控制,却以“发包者”的身份退居幕后,其权威存在变得更为隐蔽,大学校长的教育家、政治家、领导者、学术人等传统角色显然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经济社会转型对大学治理的需求。

(《领导科学》2020 年第 18 期《现代化治理背景下大学校长领导力的建构》任珂 文)

教育文摘 周报

主管:
教育部

主办:

NIES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ciences

院内管理:

教育研究 杂志社
EDUCATIONAL RESEARCH出版单位:
教育文摘周报社

1984年创刊

每周三出版
本期12版

总 编:邓友超

执行主编:马延伟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1-0180

邮发代号 81-11

中国邮政报刊订阅网或全
国各地邮局均可跨月订阅全年订阅价:182元
零售价:每份3.5元
季度价:46元
半年价:91元开户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北太平庄支行

户名: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银行账号:
0200010009014470933征订热线:
010-62003852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46号

邮编:1000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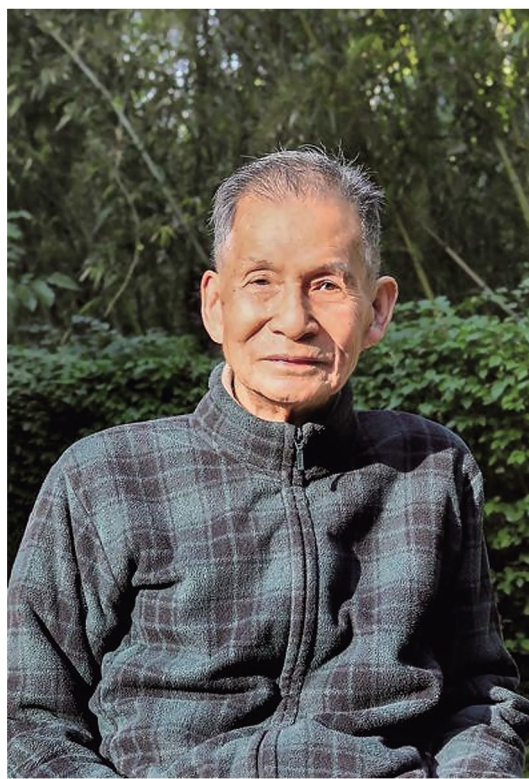
邮箱:
jywz2019@163.com

印刷:工人日报印刷厂

扫码微邮局
轻松订本报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

声明:由于部分稿件作者地址不详,无法及时发放稿费,请作者与本报联系。本报部分配图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来函来电,我们将及时修正处理。



恩被于物,泽及后代

比起拿杨先生当爷爷的学生们,师从杨恩泽25年的天津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教授于晋龙,则在杨先生的严格与宽厚中,体会先生的“君子之风”。

于晋龙刚参加工作不久时,准备申请学术生涯中的第一个大项目,心里没底,踌躇许久后,终于向杨先生开口请求,希望先生能引荐一下。先生当着他的面给评审主席打了电话,语气严肃地说:“我单位于晋龙同志申报了这个项目,希望你能严格把关。”

于晋龙当时呆住了,他想不通,“我是先生的弟子,他能帮别人,为什么偏偏不帮我?”多年后他才渐渐明白,“先生是在教我,希望把我教成君子。”

杨石的印象中,父亲简朴一生,对自己十分苛刻。科研经费应有的提成他不要,他说“国家给我的是8小时的工资,我不应该再额外领取”。见家里的家具太旧了,儿子趁父亲不在家的时候,偷偷一件件置换。有时候,父亲发现后有些不满,沉默了半天说:“那个还可以用。”

杨恩泽的女儿杨晶回忆,小时候有一次独自乘公交车,因为人太多,还没挤到售票员那儿就到站了,于是没买票就下车了。父亲知道后,步行20分钟到公交车站找售货员买了一张价格相当的票。

但是对别人的难处,杨恩泽是出名的大方,无论认识不认识的朋友或学生,只要有困难,他都会慷慨解囊。

2005年年底,天津大学自动化学院实验室收到一张从广东省饶平县寄来的10万元捐款收据,杨恩泽捐资助教的事情才被知晓。但熟悉杨先生的人并不感到意外。天津大学光通信实验室初建时,杨恩泽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自己的科研奖金,用于仪器购置。

听说家乡基础教育还很落后,杨恩泽帮家乡学校联系获赠了一批电脑,随后拿出30万元帮助城镇中心小学建一座科学楼,并设立奖学金,承诺每年资助生活困难、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捐完钱后,他的存折里只剩下5元。

第二年,一栋面积为694平方米的科学楼在当地中心小学落成。“恩被于物,泽及后代”的红色条幅高高悬挂在楼上,许多孩子的科学之梦在此启航。杨恩泽常说:“我的一切都是党和人民给的,我要把自己的一切都回报给党和人民。”

他本与儿子约好,在实验室里度过自己的百岁寿辰。儿子设想,那也算是父亲与奋斗一生的实验室的告别,他希望父亲享受没有工作的生活。然而,杨先生没等到与实验室道别的那一天。

“也许你太爱你的实验室,这一次你没守约,而是去了天堂,继续你钟爱的事业。”儿子心中那个和蔼、善良、朴素、纯粹甚至有点天真的老头,走了。

《中国青年报》2020年11月27日《把一切全给了学生》胡春艳 文)

光通信开拓者杨恩泽:
恩济天下,师泽百年

【个人简介】杨恩泽(1919-2019),男,广东省饶平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九三学社社员,高级工程师,天津大学电气自动化与信息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光通信领域元老级专家。2019年10月9日,杨恩泽因突发脑溢血逝世,享年100岁。

对杨恩泽来说,科学研究是生活日常,也是生活之乐趣。去世前几日,他依旧如同过往数十载一般,于清晨薄雾中踏上办公室的路。

在天津大学这岁月中,他主持并完成8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863”攻关项目及科研课题,主编了《光数字通信接收机》,在一级学术刊物上发表十余篇论文。

杨石念及父亲年事已高,曾想将父亲留在深圳家中赡养,可无奈的是,“父亲在家中总爱打瞌睡,提不起精气神。”杨石说,最后还是让父亲回到了他热爱的学校。

从教70余载,学生把杨恩泽当作事业的导师、人生的楷模,而他则把培养学生看作与完成科研课题一样,“是自己回报党和人民的成果”。

天津大学自动化学院光纤通信实验室负责人于晋龙教授1994年进入天津大学读研究生时,师从杨恩泽老先生。在他的眼里,老先生是“君子之师”,“他严于律己,自己要做一名堂堂正正的君子,他也教自己的学生们,要做君子,知学明礼。”

在国内光通信技术领域,杨恩泽是元老级科学家。他主持研制的“武昌—汉口市话中继光缆通信实用化系统”,是我国第一条通过国家鉴定及验收的实用化光纤通信线路。

这条线路的建设又称“八二工程”。在杨恩泽教授的追思会上,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党委副书记向军回忆起了杨恩泽和“八二工程”的故事。

“1978年邮电部提出建设这条线路,杨教授被任命为总工程师。当时光通信在国际上才刚刚起步,国内更是一片空白。为了线路的建设,他呕心沥血。”他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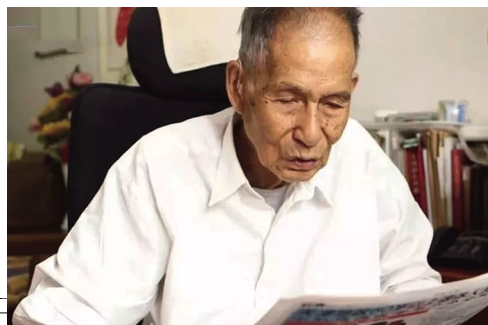
杨恩泽生前接受采访时说,曾在光纤的焊接上遇到难关,按要求焊接点的衰耗指标应达到3分贝,可当时没有人能做到。杨恩泽找到电缆厂,一同研究方案。“为解决这一问题,大家整整争论了3天,可见难度之大。”

按照方案要求,这条全长13.6公里的光通信线路分为3段,最长的一段6.5公里。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线路最长只能达到5.5公里,为了这最后1公里,杨恩泽和助手整个夏天都“宅”在平房里做实验。“武汉的夏天太热,整天汗流浹背,都来不及擦。”杨恩泽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试验获得成功,线路铺设胜利在望。线路跨越长江那一天,杨恩泽带着同事们高兴地走上了长江大桥,几十个人手递手,小心翼翼地将光缆递过了长江。“那可是宝贝,没敢使用机械来拉,生怕拉坏了。”杨恩泽回忆说。

1982年12月31日,项目截止日期的最后一天,线路终于开通。

这条线路的开通推动多个城市在短时间内建立起光通信系统,推进我国光通信事业的大发展。



杨恩泽到天津大学任教,白手起家建起了天津第一个光通信实验室。

在天津大学光通信实验室初建时,实验中急需一台26万元的科研仪器,可这笔“巨款”难倒了大家。得知情况,杨恩泽毫不犹豫,带头放弃了原属于自己的正常科研提成用于仪器购置。实验室的老师们纷纷响应,保证了实验正常进行。

杨恩泽老先生怀科研赤子之心,立科研救国之志,终其一生,潜心于科学研究,为我国通信事业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新华每日电讯》2019年10月25日)

欢迎订阅

教育文摘 周报 (2021)

- 聚焦教育热点难点
- 解读重大教育政策
- 分享教育前沿资讯
- 普及教育科学知识

请在当地邮局订阅或本版左侧扫码订阅

邮发代号: 81-11

全年定价: 182.00元

发行电话: 010-62003852

户名: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账号: 0200010009014470933

开户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北太平庄支行 (汇款务请注明“订报款+汇款单位全称+电话”)